

吉林省

日本侵略军屠杀怀德镇人民

刘金贵

1931年12月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怀德镇。他们进城后打着“剿匪”的旗号，肆杀无辜。12月5日，日本指导官犬原带爪牙在城内外逮捕了18个怀德老百姓，并把他们圈在怀德衙公所院子里，强令这些绑缚着的百姓一字排开。不从者，督责以马鞭。一鞭，一道子血。之后，大刀抽出战刀，狼似地叫着，对他们的脖子挥刀就砍。有的，竟一刀削掉两颗人头，凶残极了！有的；虽人头落地，但躯体还挺立着，颈上的血直蹿，大刀如狗夺食，哼哼着，踹倒尸体。没一会，18个冤屈的中国人都惨死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屠刀下了！随之，大刀指令警察沿街摆一大溜板凳，将人头置其上示众。血直染了半条街，其状目不忍睹。

1934年，怀德镇又来个小野田指导官。他杀人较其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10月20日，小野田指挥警察一次就抓了19名所谓不轨群众，押在警察署后院。一天中午，小野田把警察署

院的后门打开，放出押着的人，松了绑，令他们逃跑。这些人一逃，警察的枪一齐扫射。小野田管这叫练枪法、“打跑”，19名无辜群众无一幸免。被打死的人，有的摔断了牙，有的撞露了头颅，令人发指！

（摘自《公主岭文史资料》第二辑）

黄柏惨案目击记

高富昌口述 高其昌整理

伪满初期，大汉奸李寿山的叔叔李翰臣，住在磐安县（今集安市）黄柏甸子村经商。当时一支抗日武装要换装，给他送了个信（当时叫“黑帖”），勒令他按期将200双太桦桦胶皮鞋，送到指定地点。李翰臣本无爱国心和民族感，但迫于这支队伍的威力，不照办怕饶不了他，于是迫不得已按数给送去了。

不料此事泄露，被伪宪兵第五团知道了，把李翰臣逮捕入狱，押在磐安宪兵队。李翰臣的家属，急忙给他的侄子李寿山送了个信，向他求救。这时李寿山正在临江讨伐抗联，闻讯赶到集安。第五宪兵团司令姓王，是个回族。他听说李寿山来了，急忙赶到东门外迎接。我当时在县城兴安学校任首席教师，也奉命随同校长组织全校师生到东门外列队迎接。

李寿山来后，住在福盛裕商号，与宪兵第五团王司令交涉。王司令碍于李寿山的势力，不得不让步，于是与李寿山密谋了一个办法。责令黄柏甸子警察分署和村公所，逼迫当地的老百姓到县里来保释李翰臣。老百姓被逼不过，只得赶到县城保释。有个地主没工夫来，让他家雇的小猪倌拿着他的手戳，跟随大

家进城保释。据说还有个游乡的匠人，正好到这个村干活，为了凑人数，也一块被顶了人数送进城里。共计来了几十人，被伪兵团安排在县城“公和顺”杂货店的货屋子住下。

伪宪兵团王司令开庭审判李翰臣。李翰臣按着事先教他的供词说了一遍，表白他没通抗联。伪宪兵团王司令问他能否找到保，李翰臣说能找到。伪宪兵团王司令便说：“给你两天期限，找保释放。”

两天后伪宪兵团王司令又过堂。李寿山把事先逼来的百姓弄到大堂上作保。当证人画了押，将李翰臣释放后，却把全部保人扣押起来。诬陷这些保人通“匪”，要治罪。于是将这些保人的上衣扒了光着膀子，用皮鞋踢、棍棒昼夜拷打。并用老虎凳、灌凉水等刑罚上刑逼供：在“公和顺”附近，惨叫声昼夜不断。使路过的行人，无不感到毛骨悚然。伪县长汪毓昌与警卫队长佟某某从旁路过，那些被害的百姓齐声喊道：“汪县长！我们冤呐！”汪毓昌明知他们冤枉，却佯装没听见，匆匆过去了，根本不予理会。

一天夜里，在南门外屠宰场挖了8个坑。伪宪兵进到“公和顺”商号的货屋子，伪善地对那些保人说：“快过年了，你们都想家了吧？马上就要放你们了，今晚放8个，谁先出来就放谁。”他的话刚说完，呼啦一下挤出来9个，那个小猪倌也挤出来了。伪宪兵数了数多了一个，叫谁回去谁不回去；他只好把这9人都带去了。带到南门外屠宰场那儿，把这9个无辜百姓砍了头，（按：还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人用笔乱点了一个名字，拉出去后，杀了7个）。为了暴尸示众，伪宪兵把这9颗头拣回来，放在“公和顺”的下屋库房子里。“公和顺”掌柜的姓于，大儿子叫于洪开，是管帐的；二儿子叫于喜开，和我是同学。这天于喜开夜里到下屋库房找东西，被什么绊了跟头，他找亮来

仔细一看，竟是9颗人头，吓得他几至昏厥。十几天后，便因惊吓而死了。

剩余的保人即将再次被杀时，我父高德隆听说了，托人给辑安商务会长李良斋送了个信，让他把我家与他家以及张世荣、宁卫清四家开的买卖“义丰厚”，兑出我家的股份，作价两千元大洋，让他拿这钱去买通伪宪兵第五团的翻译官，求他说情把幸存的保人释放。李良斋按我父亲的办法做了，翻译官收了两千大洋，不久把剩余的保人放了。

但我次兄高华昌回忆说，翻译得到钱后，又杀了一批，才把剩余的无辜者释放了。

（摘自《集安文史资料》第四辑）

血洗小西沟

姚玉清 刘占文 赵希桥 李树森整理

1932年8月7日，日军在我们海龙县黑金堡村陈家街屯小西沟（现为四八石乡刘木村），制造了一起大惨案。在这次惨案中，有128名无辜群众被驻海龙县山城镇的日本守备队杀害。

1932年8月，住在海龙县小西沟的张振魁娶妻。张是这一带出名的地主。为了炫耀自己的势力和威风，他在院外场院上搭了两个大席棚，雇了两伙吹鼓手，吹吹打打；晚间还有说大鼓书的、唱“蹦蹦”（二人转）的，全屯都热闹起来了。

8月7日是娶亲的正日子，天刚放亮，送礼的人就陆续地到张家来了。伪区分队的村兵也背着枪前来助威。开“早席”的时候，一个姓刘的小伙子，端着方盘，给“席棚”里的

宾客上菜。他从厨房出来走到院当心，突然一声枪响，他应声栽倒在地。接着，枪声便像爆豆似地响了。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惊呆了，这时又飞来一颗炮弹落在院子里，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又有几个人倒在地上。“不好，鬼子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这时，被吓傻了的人们才清醒过来，于是，人们惊慌失措地四处奔跑。有的顺山沟朝北跑，有的往东岗逃，有的朝西坡跑，我也在慌乱中跑出了张家大院。这时，日本兵站在岗顶上看得清清楚楚，人们往哪里跑，他们就往哪里开枪射击。只听人群里一声接一声地惨叫，只见跑着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中弹身亡。顺山沟跑的群众由于目标明显，有数十人被打死在小河边。日本兵射出的子弹很密集，无法逃跑的群众，只好藏在小桥下，或藏在柳树毛子里。日本兵用掷弹筒向张家大院猛轰，老孟家12岁的姑娘被炮弹炸得尸体都找不全了；有一个姓胡的赶车老板，他媳妇抱着孩子没跑出大院，被炸死在磨盘旁边了。枪声停了之后，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进了张家大院……后来，侥幸活命的傅万和说：他们没跑出来的人，有的藏在柴禾堆里，有的趴在炕沿底下，有的跑到仓库里，可是都没有躲过杀身之祸。他在柴禾堆后，亲眼看见日本兵把张文学从屋里拽出来，一刺刀挑死了；杨小年趴在炕沿底下，也被日本兵用刺刀扎死了。最后，日本兵又把院里剩下一些人赶到了院外的场院上，让把上衣都脱下来，跪在地上，然后一个一个地拷问谁是“胡子”。张纸坊的掌柜张庆山，在村上管点事，日本兵把他拉到前面，问他这些人谁是“胡子”，他说：“谁也不是。”又问他知不知道“胡子”在哪？他说：“不知道。”日本兵就用枪把子打他，把他打个死去活来。这时，日本兵发现了藏在路旁小桥底下的人，就对着他们扫了一阵机关枪，藏在小桥底下的十多人全给“突突”死了。

这场惨案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8月6日那天，特务跑到山城镇，向日本守备队报告：“海蛟”带领人马驻扎在小西沟，还说明天张振魁娶亲，“海蛟”去参加婚礼。日本守备队立即派了五十多个日本兵连夜出发去“剿匪”。他们在距离小西沟15里地左右的中腰堡宿了营。第二天太阳刚露头，他们就来到小西沟的西岗上。架上机枪和掷弹筒。这时，屯里唢呐高奏，人声喧闹，一片喜庆新婚的景象，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杀身大祸，竟然从天而降。

在这次惨案中，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屠杀给小西沟留下了128具血肉模糊的尸体，造成一百多户家庭的悲剧。日本守备队走后，小西沟一片血海，儿哭娘、子喊父、妻喊夫、撕心裂肺……其悲惨之状，实在难于形容。整整3天，人们才把被日寇无辜杀害的亲眷安葬完毕。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这起惨案，海龙县人民特别是小西沟的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辉南县油锤沟惨案

刘桂芳口述，董世强整理

我叫刘桂芳，今年56岁，小时候家住在油锤沟。油锤沟在现在的辉南县棱街东南几里远的一个沟岔。我8岁那年（1933年）日本鬼子血洗了油锤沟，全屯老老少少差点都给杀绝。

那时，我们屯只有3户人家。我家之外，还有一个姓贾的，一个姓李的。我家9口人，我奶奶刘孙氏，70多岁；我爹刘宝，

40来岁；还有一个15岁的哥哥，叫刘魁武；一个17岁的嫂子；一个姑舅哥哥，十八九岁，叫史魁武；一个姑舅姐姐，小名叫小丑子；我的姨父也在俺家住；我还有个6岁的小弟弟。姓贾的家4口人，老两口领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姓李的家3口人，小两口领个小舅子。全屯一共16口人。俺家从我爷爷那辈就住在这儿。

俺屯子旁边有条沟，俺们这3户人家都在沟过头，沟那头有个空房子，是一个姓王的搬走了，扔在那儿的。

那年9月26日，傍晚上的时候，来了20多个抗联红军战士，住在俺们几家里。我家三间房，住不下，奶奶就让嫂子、表姐、我和小弟搬到沟那沿的空房子里去住。第二天天还没亮，奶奶把嫂子和表姐找回去给抗联做饭，我和弟弟还在那儿睡觉。天快亮的时候，猛丁传来一阵枪声，把我和小弟吓醒了。我们忙躲在炕沿根底下，我抱着小弟弟，使劲往炕墙那儿挤，一动也不敢动。枪声越来越紧，炒豆似地响成一片，有时枪子就像从我们头上飞过去，吓得我们透不过气来，不知出了啥事儿。枪声里还夹杂着日本鬼子的叫唤，才知是鬼子来了。后来枪打得稀了，往东边下去了，我和小弟还是不敢动，等着大人来接我们。可是不知咋事儿，过了挺大一阵功夫，大人还没来。后来才知道，楼街警察署的翻译官吴小个子（吴崇秀）领着鬼子寻着抗联的行踪，圈了油壁沟，打枪那阵子，是抗联领着老百姓往外冲，一直往东去了，日本鬼子也追了上去。我和小弟等到快晌午了，趴在那儿真难熬，又不敢动一动。正不知咋的是好，听到屯里又响了枪，还听到有人哭叫，听到叽哩哇啦的日本话。我们不知又出了什么事，吓得不得了。忽然，日本鬼子往俺这儿打起枪来。我搂住小弟，死死往墙角那儿躲，一动也不敢动。鬼子打了好大一阵子枪，才停下。我生怕来抓俺姐俩。大概鬼

子寻思这边没人，没过来。

不知又过了多大工夫，听到有人喊，乍着胆扒着窗户一看，妈呀，屯子里着了火，三幢房都烧落架了。丁家街、柳毛沟的老百姓，有的在救火，有的在旁边看，我知道鬼子走了，才敢出去。

回到家，我吓傻了。门前的树上挂着半个人脑袋，是让日本鬼子的战刀劈下来的，辫子和脸还都在那上面。这是我表姐小丑子啊！大家救灭了火，我在门后找到了奶奶和爹。奶奶的肚子被剖开了，爹也是让刺刀挑死的。娘子死在屋里，她的胳膊被砍断了。表哥、娘父也全都搞着死了。那时，我哥脊背是水，他回来了，我抱着他哭，哥也哭，他跟着抗联跑出去以后，躲在冰棍屋下，没回来，才免了一死。我们拉家9口人，就剩下俺们哥仨替抗联运东西的。帮抗联运东西的两个姓李的老百姓也被鬼子杀死在俺们家。

有人在老李家的后园子里看到了老李家媳妇，一身黑，脸都吓白了，她的胳膊肘子撞打个窟窿。女伴闻知李家事，她才说：“跟抗联跑出去，听到屯里没动静，寻思没啥事，大伙就回来了，谁知鬼子二话没说又回来，这伙野兽见人就杀，把我弟弟和掌柜的（爱人的俗称）都杀死，还打我一枪，我躺下装死，才躲过来。鬼子杀完人，又放火，我在屋内，又是烧又是呛，强挺着不敢出去，直到约摸鬼子走了，才扒着窗从起火的后窗户跳出来，藏到园子里。”

老贾家男的领着儿子出去办事，媳妇和女儿在家，也让鬼子杀死了。

那一天功夫，全屯16口人，加上帮抗联运东西的两个老百姓，总共18个人，让鬼子杀死11个人。真是惨啊，放火烧完了，地上的血还看得见，到处是又腥又臭的死人味。

打那以后，我们活着的人都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了多年的油锤沟。

(辉南县政协供稿)

血洗四道河子村

姜永学

四道河子是汪清县罗子沟以西15华里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只有28户朝、汉族居民。离四道河子不到10里处，有个名叫四间房的地方，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团的密营警戒哨。再往上三十多里路，就是秃老婆顶子，整个山顶都是郁郁苍苍的密林覆盖着。山脚下快满了荆棘和藤萝，是野兽也都难以穿过的地。在山顶上象簸箕状的山坳里，有几栋小草房，这就是三团的秘密营地。

四道河子是革命军管辖的抗日游击区域，村中有个较大的三间空瓦房。革命军一到四道河子，常在这里开会，教唱革命歌曲，进行抗日宣传。群众也冒着生命的危险，常往四间房三团密营警戒哨里送情报和粮食，东北人民革命军五军军长周保中等也常到这里，所以人们称它为“共产党司令部”。

1934年秋，四道河子反日会负责人王树彬，把亲日分子徐日南扭送西沟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并严重警告他“你不要为日本鬼子卖力，不许给鬼子当狗腿子。”当时徐的表现较好，有悔改自新的决心，开了群众大会，释放了拘押两个月的徐日南。

同年腊月下旬日寇狮子团长带领日伪军讨伐队从东宁来到

五甲屯准备过年。贼心不改的徐日南偷偷跑到红袖头^①讨伐队去告了密。他说：“四道河子是共产党的老巢，都是共产党，没有一个好人。”瘸子团长当晚召开只有日本人参加的秘谋会议，筹划了血洗四道河子的罪恶勾当。

1935年一月十五日（旧历），正值元宵之夜，四道河子的群众还在甜睡的时候，瘸子团长率领的一百多名红袖头伪军，把屯子包围了。到拂晓时分，一阵枪炮声过后，喊杀声、惨叫声响成一片。村东头的几家房子已被敌人点燃着起了火，敌人在屯子里横冲直撞，遇房就烧，见人就杀，仅1个小时全村的无辜群众一个一个倒在血泊里，一栋一栋的房子都化作灰烬。

大屠杀是从村东头开始的，吴禹俊、金群三等几家首当其冲。双目失明的丛树山母亲，腹部被敌人的刺刀挑得肠子都淌了出来，可是她的生命的最后一息也紧紧抓住已死的两个孙女的手，挣扎在血泊中，他的三儿子丛树人和赶车的老邹头儿，双双捆绑在一条绳上惨死在屯中央的水井边。他俩的头部各中了三发子弹，鲜血淋漓，脑浆并流。单身汉老般头正在煮饺子时突然被敌人刺倒在锅台旁边死去。残暴的敌人还把受惊的群众统统赶到麦秸垛旁，用机枪射扫，进行骇人听闻的集体大屠杀。受难者当中还有外来的群众。三道河子的吴明学老人上山下夹子抓野鸡，正巧碰上讨伐队被打死。珲春县的地下工作者李英实和他的女儿来到金群三家，也惨遭杀害。

这场大屠杀，共杀害了57名无辜群众，其中16名是用刺刀挑死的。

在这场大屠杀中侥幸保住性命的，只有屯北头的三家人。当晚被枪声惊醒了的栾用德老人，他急忙从家里跑出来一看，四

^① 红袖头：伪满靖安军，因军服袖子上镶有一道红布条而得名。

周看不见一个革命军，便知道事态不好，立即大喊“乡亲们！赶紧往河套后边逃啊！”薛德有、老丁、栾用德三家的男女老少听到喊声顾不得穿鞋光着脚急忙跑到河边毛林子中藏身，一直等到敌人撤走。这样只有三家的12口人幸免杀戮。

天快亮时，村子里面再也找不到人的影了。穷凶极恶的敌人，这才集合队伍撤走。临撤时，还将老邹头精心饲养的两匹大青马也抢走了。

天亮之后，三道河子的百户长金龙云和邻近屯的乡亲们赶到四道河子，从麦秸垛旁的尸体中共救出了8名幸存的朝鲜族婴儿。他们当中有负伤的，也有在被杀害的母亲背上呻吟着的幸存的孩子，他们已成为都没有爹娘的孤儿了。金龙云自己留下一个女孩子，其余孩子部分给愿意抚养的汉族人家。

虽然讨伐队已撤去，可是怕他们再来血洗。等到第二天上午才收拾尸体。有亲戚的遇难者，由亲戚钉简易棺材盛殓掩埋；全家被害的、没有亲戚的，就埋在菜窑里。

汉族青年丛树山和朝鲜族青年李××是二个幸存的孤苦青年。他们怀着满腔的悲愤，当天就找三团的密营警戒哨四间房去了。三团政委当时接见了他俩，他们流着热泪诉说了四道河子大屠杀的惨状，并恳切请求道：“请革命军收下我们吧！我们要报仇雪恨！”

三团政委立即派一个班赶到四道河子察看了屠杀实况，第二天便批准他们入伍了。

（摘自《吉林党史资料》1987年第4辑）

血洗张酒局子屯

尹永安

1935年4月中旬种地前，农民刨茬子的时候，驻吉林四平的日本守备队，由一中尉率领在野外行军，到梨树八区智球村的张酒局子屯（仅有几家的小屯）时，正值一支抗日队伍在这个屯的田家大院里吃饭，放哨的人暗伏在炮台上，看见来了日本兵，一枪就把领队的日本中尉击毙落马，接着又击伤1名翻译。

日本守备队深恐已方人少，还击不久，即行溃走。这支抗日武装缴获了枪支武器和一匹战马，随后开走。

第二天，从四平开来日本守备队和保安队共130多人，开着汽车（由我驾驶），带着小炮，气势汹汹，直奔张酒局子屯。

日本守备队用武装逼着全屯男女老幼，全都到屯南大坑开会。连喧闹的婴儿也得抱着，有一个串亲戚的外屯人也在其中。

敌人在南大坑四外早布置了岗哨，谁也不许动。群众集中之后，日本守备队马上用机枪扫射起来，可怜全屯48人，全被屠杀在大坑里，房子也被倒上煤油，放火烧了。

事前，田家有个小孩到树趟子里去玩，这时正往家走，先听到枪响，又看见房子着火了，再看有日本兵，就扭头跑了。日军发现了他，对他开枪，子弹在小孩左右打得直冒烟，幸未打中，总算逃出虎口。全屯只剩下这个孩子。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日寇血洗东北岔

王维宇

1935年10月20日，日本侵略军为彻底摧毁那尔轰抗日根据地，组织了大批日伪警察和部队，进剿血洗了东北岔，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北岔惨案。

东北岔即那尔轰。地处靖宇县（原通江县）至桦甸县公路腰间地段，昔日的东北岔崇山峻岭，林海茫茫，俗称老山里。

1932年以后，杨靖宇将军就指挥抗日部队在这里活动。先后组织了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性组织。群众发动起来了，参军参战、送衣送粮、传递情报，掀起了抗日热潮。这里成了抗日联军的根据地，日伪当局的心腹之患。敌人曾多次发动袭击，均被我抗日军民击退。

1935年10月，日本侵略者得知抗联一、二军在那尔轰会师，先后两次召开了抗日大会，便恼羞成怒。经密谋策划，决定采取大兵进剿血洗的办法，摧毁那尔轰抗日根据地。

10月20日，侵略军调动了大批日伪警察部队，分兵三路向东北岔一带包抄而来。一路由通江县桑文海为首的警察大队带路，日伪军百余人，向东北岔扑来；一路由驻辉南县日伪警察组成的100余人，由辉南出发直奔西北岔；一路日满军50余人，由特务“付罗圈”当向导，从桦甸出发，经王家店，向东北岔扑来。

这天早上，人们吃过早饭，开始了一天紧张劳动。有的收割、打场，有的做家务，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大祸从天而降。

这次屠杀是从二岔开始的。四道沟沟门老宋家，只有七旬老汉一人在家，这伙鬼子进沟后，一脚踢开大门，提着刺刀直奔老人。宋老汉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就被他们刺死。随着老汉的一声惨叫，老人的心脏已被刺刀挖出胸膛。紧接着便是火光冲天，几代人生活居住的房屋被化为灰烬。

在地里干活的人们看到火光，听到枪声，马上明白是日本鬼子来偷袭村庄。人们慌忙扔下手中的活，跑回家中，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向山里奔逃。手无寸铁的人们，还没有逃离，枪声已经大作，霎时间，路上的奔跑声、枪声，夹杂着女人、孩子的哭声和村民的喊叫声，昔日宁静的小山村，顿时一片混乱。

小西头村王永富家，一家7口全部丧生。六号桥吴德福双目失明的老父亲惨遭杀害。老罗子沟一家姓刘的，有老头、老太太、儿媳及两个孙女5人在家。鬼子进院后，发现在院里喂鸡的罗家媳妇长得标致，便将其逮住，调戏侮辱，媳妇拼命挣扎叫喊。公婆闻听后，跑上前去阻拦，婆婆跪在地上求饶，可是灭绝人性的鬼子哪里肯放过，他们杀红了眼，端起刺刀，将他们一一杀害了，全家5口都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东北岔河南，有个哑巴正在娶亲。婚礼刚刚进行了一半，鬼子进沟了，人们纷纷躲藏，哑巴新郎因要藏东西，晚走了一步，竟被敌人刺死在新房里。有一位妇女，听说鬼子来了，抱起唯一不满周岁的儿子就拼命往外跑，刚跑到院中，就被迎面闯进的鬼子刺死在院子里。不满周岁的儿子吓得哇哇大哭，鬼子伸手抓起小孩的两只小脚，一劈两半，摔在石头上，母子二人就这样惨死在院子里。

就这样，他们一路杀人，一路放火。下午2点多钟，他们杀到大东沟冯明臣家，见到人去房空，气得鬼子将冯家所有的东西全部点了火，冯家兄弟在山林中，看到自己家中几代人省吃

俭用积攒的家产，一时间成了灰烬，气得要跟敌人拼命，被老父拦住，老父气愤地说，这笔帐总有一天要算的！

长发沟王永德家里住着一位养伤的抗联战士。他听到消息后，拖着带伤的身体，奔跑于东北岔一带的沟沟岔岔。他见人就喊，见房就叫，“日本鬼子来杀人，快逃吧！我就是从长发沟跑出来的！”他带伤跑遍了老鹰沟、付家沟、老罗子沟、高丽沟、老畜沟，使村民们都得以安全转移。当他跑到东大沟准备进山时，发现张树启家还有人没有走，就又返回去通知人们赶紧撤离。就在这时，鬼子进村了，这帮杀人的魔鬼，二话不说，罪恶的刺刀就穿透了他的胸膛，其他二人也被刺成重伤。这位英勇的抗联战士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这样牺牲了。

还有的乡亲被杀死在苞米地里，有的人手里还拿着镰刀。还有的乡亲被杀害在行走的路上。有一家在逃往桦甸的路上，不巧碰上了鬼子，躲藏不及，一家3口竟被鬼子刺死在大路上，又将尸体挂在大树上，五脏六腑都流在外面，真是惨不忍睹。

最后，强盗们杀到了于海庭家。这时东西两路侵略军相继汇合，他们发现杀错了地方，本来要杀西北岔，却杀到了东北岔。就这样，一场血洗的风暴才告停止。

这次血洗惨案持续了六七个钟头，被害群众35人，伤多人，被烧房屋上百间，烧杀村屯14个，40多户群众的畜、禽、粮、物被毁之殆尽，无家可归，其惨状是在本县历史上少有的。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的又一次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靖宇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白家堡子惨案亲历记

李忠昌

我是白家堡子惨案中侥幸活下来的人，对白家堡子惨案，我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

1936年农历五月十二日上午，我抗日联军在王志明小坎伏击日本守备队，击毙11个日本侵略者。

时隔不久，日本守备队以“通匪”为名，把白家堡子四周的德胜岗、奢鹿沟、黑瞎子沟以及大荒河南门外的大杨树，方圆20余公里划为“禁区”。对这个地区的百姓实行了严密的封锁。

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日本守备队又以递粮养为名，把白家堡子30多个身强力壮的老百姓，骗到大荒沟警察署，毒刑逼供。

第三天，天还没亮，鬼子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南沟北岔赶着成群的老百姓往外走。不一会儿，鬼子就冲到我们家，一个鬼子抓住我的胳膊，另一个鬼子朝我的胸坎上就是一枪把，然后就把我绑起来了，接着又把我姐姐和小外甥等十多个人也绑在这一条绳子上。

村里的人能走的都被赶出来了，就连从外地到这探亲的沈贵山和从东丰往临江搬家的老陈家（一家老小7口）路过这里也没放过，一起被抓走了。不能走的当场被刺死。鬼子端着刺刀赶着乡亲们往大荒沟走，一路上乡亲们走慢点就是拳打脚踢，斥骂不绝。三十多岁的刁大嫂领着2个孩子，大的5岁，小的刚刚2岁，大孩子走得慢，鬼子兵就用刺刀捅孩子脊背，孩子吓得往

前跑，被石头绊倒了，鬼子上去就是一刺刀，孩子哇地一声倒下去了。刁大嫂一手抱着2岁孩子，一手抓住鬼子的枪放声痛哭，这时鬼子一手拽枪，一手夺下大嫂怀里的孩子，摔在地下。刁大嫂不顾一切地跟鬼子撕搏，又一个鬼子上来对着刁大嫂的肚子连刺几刀，刁大嫂的肠子淌出来了，两个鬼子将她抬起来就扔到河里。回头又把5岁的孩子扔到河里，接着把那个摔在地上的孩子，也扔进河里了。

当我们走到小蚊子沟门老杨家时，杨家能走的都被绑走了，只剩下一个“坐月子”的产妇躺在炕上。鬼子端着刺刀，没容她起来，就恶狠狠地朝肚子上刺了几刀，当场刺死，鲜血溅了婴儿一脸，鬼子看到了哭叫的婴儿，又将婴儿一刀刺死。

天亮时，我们被赶到沟门我岳父陶玉春家。岳母常年有病，一个鬼子闯进屋里，用枪比划着叫她快起来。我岳母的病不用说往外走，就是爬起身子都难。鬼子端起刺刀劈头盖脑地乱刺一顿，她叫了几声就咽气了。鬼子兵出门就把房子点着了。一路上，日本鬼子像野兽一样，连杀带烧。

鬼子把我们白家堡子上下沟岔住的400多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都赶到守备队院里。房顶上鬼子架着机枪，院里的鬼子端着刺刀，严密地把我们圈困在当中，整个院子象一座阴森森的杀人场。

审讯开始了。鬼子从上屋右门，硬架进去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硬汉子，用尽毒刑，逼问口供。可是白家堡子的老百姓，没供出一点抗日联军的情况。不一会儿，从左门拖出十多个遍体血淋淋的尸体。当审问到王万山、大老徐和老胡的时候，狗翻译李大个子替他的主子守备队中队长中山问道：“抗联在哪？你说不说？”王万山愤恨地说：“抗联在哪？！抗联到处都是，你们是抓不尽杀不绝的！”李大个子把这些话翻译给中山后，中山气

得像野狼嚎叫：“你的通匪，死了死了的有！”接着他发疯似地嘶喊：“给我杀了！统统地杀了！”一群豺狼冲上来，堵嘴的堵嘴，绑架的绑架，硬把3个人吊到拴马桩上，凳子一撤，3个人就活活地被勒死了。

接着，翻译李大个子伸着细长的脖子，替他主子中山喊道：“百姓们，皇军问抗日联军在哪？说出来大大有赏，不说，（指着吊死的王万山等3人）像他们一样，统统处死！”院子里有400多人，一声不吭，鬼子无计可施，闯进人群就拽出结婚不到一个月的老黄家媳妇，威胁她说：“你的红胡子媳妇，抗联情况不说，杀！”这个年轻媳妇说：“不知道！”中山嚷叫着，一脚把她踢倒，朝心窝就是一刀，听她一声惨叫，接着就见中山把一颗血淋淋的人心挖出来挑在空中，恶狠狠地说：“中国人的心大大坏了！”

这时，院子里孩子哭、女人叫，人就乱了。鬼子中山一看形势不妙，便和翻译李大个子凑到一起，经过一阵嘀咕之后，不一会儿，南门打开了。鬼子逼着我们从角门出来，往东山根赶。跟在我身后的赵文华，贴我耳边说：“不好了，咱们不能等死，想法逃吧。”他说完，挣脱了绳子就向树林里跑，跑出20多步，就被鬼子开枪打死了。

我们慢慢地挪动着脚步。陈德华老婆是个孕妇，挣开绳子和鬼子撕拼起来，她用牙齿咬住了鬼子的手指不放；只见另一个鬼子的刺刀猛地刺出；孕妇倒下了，另一刺刀挑破了孕妇的肚子，把没出世的胎儿，挑在刺刀尖上。这种种惨状，真叫人目不忍睹。

当我们被赶到东山脚下，一些端着刺刀的鬼子紧紧地围住了我们，在山头上还架着机关枪。

大屠杀开始了。这边鬼子端着刺刀嚎叫着，先刺倒了前边

一排被绑的群众，接着，机关枪一响，后边的百姓也倒下去了。那时，我在中间，鬼子照我背后捅一刺刀，我只觉得一阵剧痛，浑身直颤，身子向前一斜，接着又连挨两刺刀，我就昏过去了。当我苏醒过来，就觉得背后木胀胀的。我睁开眼一望，天已经黑了。我刚挣扎着坐起来，只觉得背后火辣辣地一阵剧疼，就昏过去了。过了一些时候，我又苏醒过来，好歹把绳子弄断，就从死人堆里往外爬。前后左右都是尸体，遍地是血，手一摸粘糊糊的。我爬呀，爬呀，爬了多半宿，总算爬出来了。我拄着树棍子，忍着剧痛，晃晃悠悠地往沟里走……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白家堡子400多口人，除了我和郭汉臣、惠连芳3个人死里逃生外，都被杀害了。

(通化县政协整理)

白家堡子惨案

木村正二揭发材料

(1955.4.19)

- 一、时间：1936年（农历）五月
- 二、地点：通化省金川县（柳河县）白家堡子。
- 三、加害主谋者：通化省辉南县朝阳镇独立守备兵第五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大尉中山八郎。
- 四、被害者：居住在白家堡子的中国和平居民300余名。
- 五、事件经过：1936年五月，东边道南部地区，即通化、柳河、金川、闻江等各县展开了抗日游击战。盘踞在辉南县朝阳镇的独立守备兵第五大队第一中队长中山八郎，为镇压抗日联

军第一军长杨靖宇部队的抗日活动，命令其部下八岛曹长带一个小队侵入白家堡子附近部落（地名不详）。驻该村庄的八岛部队根据抗日军行动的情报，立即从驻地出发进行讨伐，结果在白家堡子附近某高地的山间狭隘被左右两侧高地的抗日军袭击，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轻机枪两挺和其他许多步枪和弹药。

接获上述战斗情报的朝阳镇中队本部，在中队长中山八郎大尉指挥下立即采取侵略行动，试图对抗日军复仇，但未发现抗日军，未遂所愿，于是向附近村庄白家堡子七八十户300余名中国和平农民转嫁仇恨，以未向日军报告抗日军的活动为理由，放火烧毁全村。300余名男女老幼村民悉遭惨杀（烧杀、砍杀、刺杀）。

六、上述情报来源：我于1936年3月2日离开该部队，故未参加该事件，离队后任伪满警察官在伪奉天省警务厅司法科司法股工作。1936年7月，独立守备兵第五大队本部（驻海龙县山城镇）书记米村秋吉曹长（我在队时的内务班长，1940年任鞍山守备队长，中尉）到奉天公出时，从他闻知此事。

[下略]

赵瑞煊检举书

（1951年9月25日）

揭露伪满时期驻柳河县日本守备队长中山大尉对白家堡子村实行集体大屠杀的血案。

一、大屠杀主谋与实施者：日本关东军驻柳河县守备队长——中山大尉（名不详）。

二、屠杀年月：伪满康德3年旧历五月二十七日。

三、屠杀地点：柳河县大荒沟村东南山根底下。

四、手段：用机关枪扫射和刺刀刺杀。

五、被杀害人数：计男女老幼 368 名。

六、目击与传述其事者：大荒沟警察白署长。

七、全部经过情形：伪满康德 3 年，约在四五月的时候，驻柳河县日本守备队派出一个小队的兵力约 30 人，配属伪警察约 20 名，组成一个“讨伐队”进山搜剿。在大荒沟里白家堡子村附近，吃了抗日联军青年队的埋伏，日本鬼子被打死 11 名。因此，激起恶鬼中山大尉的恼恨，而迁怒于当地老百姓的身上。他要屠杀无辜的人民来补偿他无可挽回的损失。他决定了报复的毒计，在败仗后二日，亲率大队将白家堡村围得水泄不通，把全村居民不论男女老幼，连吃奶孩子都在内，一个不漏地，像赶羊群似的赶到大荒沟警察署院内（与白家堡村相距约 10 里），不问青红皂白，每十数人分为一组，用铁丝和绳子绑在一起。此时正是早晨，天空还下着绵绵细雨，被绑上的男女老幼一串一串地被赶到大荒沟警察署东南山根底下，密集在一处，然后，用机关枪扫射，展开残忍无比的集体大屠杀。枪声一起，人们东撞西撞，挤成一团，弹丸比雨点还密打到人们的身上，就是铁铸的也会被穿得稀烂。一时，孩子哭老婆叫的哀号之声震动山谷。瞬息之间，活生生的 368 条生命就声息全无地倒卧在血泊里，堆成了尸山，作了恶鬼中山的牺牲品。当时的悲惨情景，非目击者实难描述。一群无罪而善良的中国人，无辜地被日本强盗给绑上了手脚，用杀人的利器——机关枪扫射，要跑不得，求活不得，只有瞑目待毙。试问人间还有比这再悲惨的事情吗？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和杀鸡犬一样，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残忍的人吗？他们在中国犯下无数的罪行，这只是千百件大屠杀惨案中的一件。更甚于此的，有名的“平顶山”事件和冀东“潘家峪”事件，比这更残酷了多少倍！

屠杀之后，鬼子叫警察抓民伕挖了 9 个大坑，将尸体给埋掉

了。埋后，警察署白署长和民伕在警察署说，他们在埋尸体时，经过清点，共杀了368名。白家堡村被鬼子放了一把无情大火，烧得片瓦无存。屈死的同胞和这场惨案被压埋了十余年，没有人敢公开宣扬，直到“八·一五”东北人民获得了解放之后，才有人把这件血案暴露出来。

编者注：赵玮系伪满第八军管区少将参谋长，事件发生时，在长春任伪满军政部军需司兵器课军马股长。

郭汉臣控诉书

(1966年1月7日)

我叫郭汉臣，今年65岁，现在大荒沟村朝阳屯。我是在康德3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被伪满日本守备队在大荒沟南山坡张慧儒的地里刺了5刀后逃出来的。如今我身上还留着日本鬼子刺下的刀痕，看见这刀痕，当时的悲惨情景就呈现在我的眼前。

伪满康德3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日本守备队去八道江“讨伐”回来时，在我们白家堡绑走了30多名男人。第二天早晨，守备队又来我们堡子，把男女老幼一齐赶到大荒沟日本守备队院里。我家8口人就是这天早晨被抓去的。日本鬼子在抓人时，将有病不能走的就地刺死。其被抓去470多人。被抓去的人，家有当自卫团和认识伪警察的，都被要出来了。剩下的三百六七十人，在当天下午，分批地押送到大荒沟张慧儒的地里，用机枪射杀和刺刀挑死。我是第一批被赶去用刺刀挑的，我身上被鬼子刺了5刀，因当时没被刺死，晚上偷偷跑回来了。我老婆、孩子都被鬼子用机枪打死了。鬼子不但把人给杀了，第二天连我村五六十户房子都给烧光了。从此，我就成了残疾人，到现在还不能干活。

张德喜控诉书

(1956年1月7日)

我叫张德喜，今年29岁，现在大荒沟村庆升屯，控诉日寇在伪满康德3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杀害我祖母张王氏和我父亲张学荣的罪行。

伪满康德3年五月二十七日，那时我家住在白家堡子，日本鬼子以“通匪”名义到我们家，叫我们全家人到外面去。当时，我祖母有病，不能出去，鬼子就拿出了刺刀，把我祖母吓得带着病就出来啦。这时，我们全村人都被鬼子赶了出来。男人都用绳子绑着，一起赶到大荒沟日本守备队院里。在把我们赶出来的半道上，我妈把我藏到道边草里，因当时我还小，又害怕，又想我妈，我就跑出来跟我妈去了。被赶来的人都关在守备队院里。在杀害我们前，我妈看见了我姑舅赵文才（当时自卫团成员），他把我妈和我当成他们家的人要了出来。我妈就把我送到张学礼家，这时，我站在张学礼家窗台上看见鬼子拉出二三十个人在大荒沟村南山坡用刺刀杀害。我害怕，又想妈，就从张学礼家往我们家跑。跑到半路上，又听到机枪响。正好遇到了我妈，就把我领到白家堡子附近的大蚊子沟王振海家住下啦。当天晚上，林××（我记不清他名字了）身上围了一件破棉袄，身上被刺了八九刀，也跑到王振海家住下了。他说，今天赶出去的人都杀了。这时我妈知道了我祖母和我父亲也被杀了。第二天，我妈带我就投到东丰县去了，直到1955年12月我们才搬回来的。日本鬼子杀害我祖母和我父亲的罪行，我永远也忘不了的。

惠树生控诉书

(1956年1月7日)

我叫惠树生，男，今年38岁，现在大荒沟村大平地。我控诉日本鬼子在大荒沟村枪杀我母亲、嫂子的罪行。在康德3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早晨，天下着毛毛雨，日本鬼子守备队到我们大荒沟白家堡子，将我母亲惠唐氏、嫂子惠张氏、妹妹惠兰芳3人用一根绳子绑到大荒沟村日本鬼子守备队的大院里。当天下午，弄到大荒沟南门外东山根张慧儒的地里进行集体屠杀。我母亲、嫂子当时被打死，我妹妹惠兰芳在左肋骨处中一枪，当时晕过去了。我母亲和我嫂子当时死在我妹妹身上，把我妹妹盖住了。在日头要落的时候，我妹妹苏醒过来，一看人死的成片成堆，看见我母亲被枪弹将头部打坏，我嫂子的肋骨揭去了。不久，天已看不见了，我妹妹爬起来，连爬带滚地跑回家里。这时正遇上我哥哥惠树云也回家去，我哥哥就把我妹妹送到警察分所李所长家给换衣服、上药。以后，在大荒沟衙治伤未治好，又去通化才治好的。现在我妹妹还住在王文川村。在那时，我们家是6口人，我和我父亲到柳河修铁道去了，我哥哥惠树云当时跑啦，被打三枪未打中，我妹妹是死里逃出来的。日本鬼子就是这样穷凶极恶，惨无人道。

查问控诉人张慧儒笔录

(1956年1月8日)

为了查明日寇守备队在伪满康德3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洗杀白家堡子的罪行，吉林省柳河县人民委员会派王清珍于1956年1月8日讯问了控诉人张慧儒。张慧儒自称今年63岁，职业中医。

问：你知道日寇守备队洗杀白家堡子事件吗？

答：知道。当天我看见守备队抓来一院子人，不一会儿机枪就响了。第二天抓我当民伕埋尸首，我看见都被杀死在我的地里了。日本鬼子就叫在我的地里挖坑，我也不敢吱声，共挖了9个大坑把死尸埋了。

问：有多少具尸体？

答：我没细看，大概有三百多。

问：现在还有尸骨吗？

答：以后狗、狼扒开了，弄我满地，我亲自往乱坟岗上拉了一些，现在还有两大堆。

问：为什么洗杀白家堡子呢？

答：日寇说白家堡子的人通匪。

问：你还知道其它情况吗？

答：日本鬼子中山大尉，不但指挥洗杀白家堡子，并且指挥部下在白家堡子周围方圆五十多里的地方遇到人就杀，见到房子就烧。我大舅子孙德林领老婆去串门，走到窑底子沟门，被日本守备队遇见抓回来啦，说是“通匪”就给杀了。

问：白家堡子有多少户？房子还有吗？

答：有五六十户。房子都被守备队放火给烧光了，现在还是一片荒地。

问：你说的都是事实吗？

答：全是事实。如有误，我负完全责任。

杨永清等控诉书

(1956年1月9日)

我们都是吉林省柳河县孤山区大荒沟村人，从小就以种地维持生活。自从日本鬼子来到大荒沟村以后，我们受尽了折磨，

但有冤无处诉，直到日本垮台了，我们才得到了解放。日本鬼子在我们村子里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永世难忘。

在伪满康德3年五月间，驻大荒沟的日本守备队中山大尉，指挥部下到白家堡子及横虎头进行“讨伐”时，在半道上被抗日军打死了11名。中山大尉听到后，亲自指挥部下把白家堡子周围东至德胜岗，西至睿鹿子沟，南至黑暗子沟，北至大荒沟南门外大杨树，方圆共约50里划为“通匪”区，在这个地区内遇到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更残酷的是于五月二十六日，在白家堡子一带绑来30多名男子押到警察署；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还下着毛毛雨，日本鬼子又把白家堡子男女老少一齐绑到大荒沟的日本守备队院里。当天下午3点多钟，把所绑来的人分成十几批，押至大荒沟南门外东山根张慧儒的地里，用机枪和刺刀进行集体屠杀，有的小孩就活活给劈开了，很多人家如朱作田家4口人，宋树玉家5口人等都杀绝了。当时未被杀死的，鬼子就用刺刀挑，郭汉臣就是被鬼子刺了五六刀后跑出来的。现在他身上还有当时被刺的伤疤，他因被刺成残废，不能劳动。鬼子不但杀了人，第二天又将白家堡子五六十户的房子及粮食等全部财产放火烧光，使这个堡子到现在还是一片荒地。五月二十八日，鬼子又把我们村张慧儒、张庆荣等抓到现场挖埋尸体，我们看见被杀害的人有三百六七十名，就在张慧儒的地里挖了9个大坑埋掉了。

杨永清、梁国珍、朱振兴、张成作、张维新、

刘凤英、赵文财、慕长荣、王家顺、耿福田、

王永和、尹明君、赵福德、刘扶麟、张凤鸣、

陈万银、关万禄、关石成、张庆荣。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东北历次大惨案》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

回忆白家堡惨案

惠连芳等口述 辛愚圣整理

1936年7月15日，日本侵略军杀害了白家堡无辜百姓400多名，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白家堡惨案。1984年重访了这次惨案的幸存者和目击者。下面是他（她）们的回忆口述笔录。

丛树才口述

血洗白家堡子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大荒沟上面道北的头一条沟——丛家沟。我们丛家老一辈子是这个沟的占山户。

那时，我们家里住着7口人。我父亲丛德玉当牌长，我姐姐那年19岁，出嫁了。因母亲去世了，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姐夫王德发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哥12岁，我妹妹8岁，我9岁。还有一个老李头，是我父亲的磕头弟兄，常年在我们家呆着。头一天，我舅来串门，也住在我们家。

那天（阴历五月二十七日）早晨，天刚朦朦胧亮，我大姐起来生火做饭，就听狗在院子里叫，我父亲到屋外一看，是村子里姓胡的一个小伙子，他说：“村长让我告诉你，昨天你们牌摊的民工一个也没去，今天一定要去，日本人不让了。”我父亲答应去催一催。说完，父亲就往沟里走，去催人。姓胡的小伙子就往沟外走，没走多远，狗又咬起来了。这时候，我们都起来了。往沟门一看：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奔沟里来了。姓胡的一看不好，就往山上跑了，我们还听见日本兵喊骂他的声音。

我姐夫年青力壮，怕叫日本人抓去背给养，从后窗跳出去跑了。我父亲本来想上沟里去派民工，一看日本兵来了，他也跑了，一边跑一边召唤年青人：“快跑，日本兵来抓人了！”

家里剩姐姐、哥哥、妹妹和我，还有舅舅和老李头。我们很害怕，老李头说：“怕什么？咱们老的老、小的小。他们（指守备队）不能抓咱们去背给养。”我们都在屋里呆着，日本兵一进院，我舅舅急忙把放在炕上的一个大吃饭桌子立在了炕角上，他藏在了桌子后面，日本人没看见。

日本兵进屋就把老李头拽下了炕，满屋翻绳子，找了些晒烟绳子，就把老李头、姐姐、哥哥用绳子捆起来了，看我和妹妹小，没捆。留一个日本兵赶着我们往沟外走，其余的日本兵又上沟里赶人去了。

在丛家沟门的平地上，有一个姓陈的开了个大车店，把我们都赶到大车店的院里，日本兵在院里架着机枪。我看见老梁家俩口子扒开障屏子跑了。

一直等到快东窗晌了，日本兵从白家堡子那边赶下来一大帮老百姓。把我们这些人又从陈家店赶来，入了大帮，往大荒沟赶。一路上孩子哭、老婆叫，有病的、上岁数的走不动，日本兵就用枪把子打，用脚踢。

‘我们早晨没吃饭，饿了。我和小妹扯着姐姐的手，直喊饿。我姑住在大荒沟南门外的道边上，快走到我姑家的时候，我姐小声对我和妹妹说：“快上咱姑家要干粮吃去，别叫日本人看见。”我领着妹妹，躲着日本兵，溜出了大帮，向姑家跑去。姑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经过一五一十地向我姑说了。她拿了些干粮，把我们兄妹俩领到仓库里，叫我俩蹲在两个装粮食的大木头筒子里。她又想去把我姐和我哥救出来，日本兵不让她靠近，姐姐和哥哥都用绳绑着，大帮人过去，我姑哭着回来了。

到了过半晌，就听着东山根一阵一阵地枪响。我姑不敢叫我们出去，怕我们害怕，她到仓房里陪着我们唠嗑。她说：“日本鬼子杀人了，这帮不是好死的，你哥才12岁，你姐19岁，他们犯了什么罪？”我和小妹听了都大哭起来……

一直到天大黑了，我父亲才偷偷地到我姑家，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告诉我们：今天被抓来的老百姓都被日本守备队杀了，我哥、我姐和老李头，也被杀了。我姑搂着我小妹，边哭边叫着我哥和我姐的小名，哭得死去活来，在场的人都哭了。

父亲怕我们兄妹俩在姑家发生意外，趁着天黑，把我们领走了。在路上，父亲又告诉我们：沟里的孙大娘，因为得了伤寒病起不了炕，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了。

我姐夫王德发为了报仇，就投奔了抗联。

丛清林口述

那时候，我住在丛家沟南边的背阴汀子。全家4口人，我和我媳妇，领一个2岁闺女。我哥那年34岁，没成家，和我一起过。

那年出事之前，抗联在沟里打死了11个日本兵，我去抬过“死倒”。

阴历五月二十六那天，我们村的杨牌长到大荒沟去开了半天会，回来告诉各户，明天都到大荒沟开会，日本人说去开会的人，每人放半月的口粮，回来好盖房子归大屯。谁知道日本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事，谁也没往心里去。

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第二天一早，我媳妇起来做饭，我去挑水。到了井湾子一看，井湾子叫雨水冲淤上了，我就用手把井湾子扒了扒。一时水混，没法挑，我就到旁边我的一块菜地里去看看。辣椒缺苗，我就趁着潮乎土补辣椒苗。正补着苗，

就听院里有“哇啦哇啦”的说话声。我抬头一看，好几个日本兵端着枪冲进了我的房里，我寻思又是来抓背给养的，就钻进草棵子里躲起来了。我不放心，从草棵子里往外看，看见日本兵从屋里把我哥和我媳妇赶到院子里，我媳妇抱着2岁的闺女。另一个日本兵到朱作田家，把朱作田也赶出来了。朱作田那几天正闹病，出了屋，走了三四步就倒下了，日本兵看他不能走了，从背后捅了好几刺刀，朱作田当时就死了，血淌了满地。

我们上屋的陶玉春跑出去了，我看一个日本兵进了他的屋，听见他媳妇在屋里“妈、妈”地叫唤了两声。日本兵出来时，刺刀上还有血呢。下屋住的老宋家全家人也都被赶出来了，他媳妇正怀孕，怀里还抱着小姑娘。日本兵把抓的人都往大道那边赶。

等日本兵走了，我先到老陶家，到他屋一看，一炕血。陶玉春回来看他媳妇还有一口气，怕日本人再回来，把他媳妇从后窗背到树棵子里；过了一会，他媳妇就死了。

到了晚上，听说我哥、我媳妇和2岁的闺女都叫日本兵给杀了。

为了报仇，我想去投奔抗联，走到半道，又叫日本兵抓去背给养，到了孤山子就病倒了。

邹绍先口述

那年阴历五月二十七那天一早，就听说日本守备队要抓人，我就跑到西山躲起来了。太阳到了东南晌，就看见守备队从横虎头沟里往下赶人。有男的、女的，不管老的、小的，都赶到守备队住的大院（现供销社院内）。把门关上了，门外放了岗。

我下了山，就往背阴汀子跑，我父亲头一天上我岳父家串门去了，不知叫守备队抓着没有。那时我刚订婚，我岳父叫宋

德玉，他们家5口人，住在背阴汀子。

我跑到半道，遇见了王永胜，他问我干什么，我说去看看我父亲抓没抓走。他说：“你不用去了，你父亲也被抓了。”我说：“你认识我父亲？”他说：“我怎么不认识？你父亲耳朵上长个肉瘤子，叫日本守备队打破了，淌了一脸血。”我一听，眼泪“唰”一下流下来了。我不死心，我还想去看看没过门的媳妇和岳父怎么样了，我一口气跑到背阴汀子。进了岳父家院里，只有满院的鸡、鸭、鹅、狗在叫唤。进到屋里一看，屋里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心里一酸，趴在岳父家的炕上好一顿哭……

第二天早晨，天一亮，我就和叔叔跑到东山根，想认认父亲和岳父一家人的尸体，归拢归拢。

到了东山根，简直不敢看，有用机枪扫的，有用刺刀挑的，有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有怀抱吃奶孩子，有砍掉头的，有捅破肚子的……真叫人心里难受。我们爷俩含着眼泪挨个扒拉。还没找着一个亲人的尸体，就叫守备队看见了，他们把机枪架在守备队大院门口，朝我们开了枪。我叔叔连忙拉着我钻了树丛子，奔了东山。

韩相久口述

我今年81岁了。日本鬼子在我们屯杀人那年，我才30多岁。

那天（阴历五月二十日），听说抗联在沟里打了日本守备队，心里挺解恨。下半晌的时候，村里派人找我，叫我去给被打死的日本兵做棺材。我说：“日本人的棺材我没做过，不会做。”看我不去，那人就回去了。过了一会，那人领着李翻译来了。李翻译吹胡子瞪眼，说话骂骂咧咧的，他说：“不做不行，小心你的脑袋！”逼我拿着工具，跟他上了守备队院里。又找了几个半

拉木匠，我掌尺，一共做了 33 口棺材。先做了 11 口大的，5 尺半长，装上尸体，浇上汽油烧了。又做了 11 口中号的，半米长，他们用这个中号的装上骨灰，埋在守备队大院东头。最后做了 11 个小号的，每个 30 公分长，听说是用它装骨灰送往日本。

过了几天，警察署的署长（他叫赵德清）叫我上白家堡子下头去盖分所，他说：盖好了分所，好在那归大屯。阴历五月二十六，屋里的（爱人）给我收拾了行李，准备好吃的，打算第二天天放亮就走。那天晚上下雨，天快亮了还打雷，屋里的说：“天下雨，去也不能干，别去了。”我就没去。

第二天一早，就看见守备队往沟里走，全副武装。不知是什么，有人说是要抓人背给养，有人说是要捉人开会。年青的都跑了，我没跑，仗着我会木匠活，我想：你抓我背给养，我就不能去盖房子。

吃完饭我就去老丈人（岳父）家，想探听探听是怎么回事。我老丈人住在大荒沟街里，他叫王明信，当个小牌长（管十几户人家）。听他说，日本人头一天晚上就收绳子，猜摸着是上沟里去抓人，抓人干什么就不知道了。正和我老丈人唠嗑，村里来人叫他派人去遛马。年轻人都跑了，没跑的也上山干活去了，找谁遛？我说我去遛。

这马，是守备队的，我牵了 3 匹，特意往横虎头沟里走，想看看守备队究竟干什么。越过山头，刚过丛家沟，就看见守备队赶着老百姓往下走。一条绳子绑几个人，大人大部分都上了绑，小孩子没绑，跟着大人走。

大帮人过来了，我牵着马站在道当央。我看见张文财经过我身边，他没绑，我顺手把一匹马的缰绳递给了他，给他使了个眼色，他就明白了。他假装是和我一起遛马的，等大帮人过去了，他顺着山道跑了，临走时直谢我。

我牵着马往回走，看日本守备队把这帮老百姓赶进守备队大院，我也牵着马进了大院。他们知道我是木匠，不叫我走，叫我和一个姓郑的木匠钉厕所。

我们在钉厕所的时候，就听见上屋里打人的声音。守备队的官叫山口，他哇啦哇啦直喊，李翻译直逼问：“抗联在哪？”“谁通匪？”没听见被审问的人回答声。后来，从屋里推出来8个人，叫守备队打的满身是血，这8个人就是头一天被抓来的。这8个人中我就认识一个姓郭的，外号叫郭老道。当着老百姓的面，李翻译说这几个人“通匪”，眼看着日本守备队用刺刀把这8个人挑死了。把小孩吓得嗷嗷直叫唤，妇女们都哭了，老百姓恨得直咬牙。李翻译叫警察把这8个人的尸体拽到后院，看到日本守备队这样杀害中国老百姓，我心如刀绞，赶紧钉完厕所，就离开了这个大院。

张秀梅口述

那年我21岁，日本杀人的事，我是亲眼看见的。

抓人那天早晨下了一阵雨，雨停了，日本守备队就往沟里走。

我和爷爷赶着猪上了东山。东山顶上，有个我们家的老房场。我爷爷看着猪，我就收拾那个房场，准备种秋菜。

到了晌午的时候，我在山上就看见日本守备队从沟里赶着一大帮人，往大荒沟村子里走。这时候，大荒沟村里年轻力壮的人都往西跑，越过河，奔了西山。快晌午时候，我也饿了，想回家。爷爷说：“守备队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咱们别回家了。你年轻，腿脚好，你先跑吧。”我说：“我不能扔下你跑了，咱们在山顶上，看见日本人来了，再跑也赶趟。”我们俩挨着饿在山上躲着。

过晌的时候，看见日本兵从守备队院里出来，在东山根放了岗，在半山腰还架了机枪。不一会，就看见从守备队院里赶出来一帮老百姓，押到了东山根。那地方原来是乱坟岗子。我在山顶上看见老百姓在日本兵跟前一个一个地倒下了，也没听见枪响。我问爷爷：“枪没响，人怎么一个个都倒下了？”爷爷说：“那准是让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刺了一帮，又赶出来一帮，一帮能有四五十人。我和我爷爷气得直跺脚。

到了日头偏西的时候，从守备队院里又赶出来一大帮，有一百多人。在山顶上就听见小孩的哭声和日本兵喊：“快走！快走！”的声音。乱坟岗子站不下，有的站在苞米地里。这回听到了枪声，是用机枪扫的，老百姓一面子一面子倒下了。我爷爷咬牙切齿地直骂日本兵。爷爷说：“回家赶紧把猪卖了做盘缠，你回山东老家吧，这不是人呆的地方。”

后来又听见日本兵给没死的人补枪的声音，直到日头卡山了，守备队才收兵回去。

我们一直等到天黑黑的才赶着猪下山，走到杀人的地方，猪都不往前走了，我们爷俩绕道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警察接户派人去埋被杀的老百姓。先挖了七八个大坑，每个坑都有一个警察记数，埋完了后，他们核的总数是374人。

到了秋天，树叶落了，在树棵子里经常看见一堆一堆的尸骨，这些都是受了重伤当时没死的人，爬出去一段后又死了。加上这些没算数的，被杀害的老百姓总共有400多人。

惠连芳口述

我是白家堡子惨案幸存者，那年我11岁。那时候，我们家正住在白家堡子。全家6口人，有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一个

嫂子和我。

我的两个哥哥，前些日子就叫警察署抓到柳河孤山子修铁路去了。

就在惨案发生的头天晚上，我大哥从孤山子跑回来。我妈对我大哥说：“今晚你别在家睡了，这几天风声挺紧，听说今天早晨还抓了二三十人押在警察署院里，你先到山上躲一躲吧。”吃了晚饭，我大哥就去山上的人家躲着去了。

我们家离大道近，我妈叫我去上屋老王大娘家躲着。那天晚上下雨，一直等到很晚了，约摸不会出什么事了，我哥和我又都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我妈下地做饭，就看见日本兵往横虎头沟里走。我妈赶紧招呼我爹和我哥：“你们爷俩还不快跑，日本守备队来了！”我爹和我哥钻了树棵子奔山上跑了。我妈又对我说：“快上你老王大娘家躲躲吧。”我脸也没洗就往老王家跑。到了老王家还没等藏好，日本兵就跟进来了。日本兵比划着叫老王大娘往外走，老王大娘说：“抓我这么个老太太干什么？”她不走。日本兵就用脚使劲踹她，把她推到院里，把我也赶出来了。

我往我们家的院里一看，妈和嫂子也叫日本兵赶出来了，日本兵用枪把子打我妈，我一边哭一边跑，奔我妈去了，嫂子跟在我妈身后哭，就我妈没哭。我们娘仨个被赶进了大帮。白家堡子在家的人全都抓来了，押着往大荒沟走。路上遇见人就抓，不管是串门的，还是走道的。

到了守备队院里，就把大门关上了。院里的日本兵端着枪，上着刺刀，明晃晃地怪吓人。旁边还架着机枪，对着院里的老百姓。院里挤得满满的，有的绑着，有的没绑。天下了一阵雨，衣裳淋湿了。我又饿又冷，我嫂子冻得直打哆嗦，我妈脱下来一件衣裳给我嫂子披在身上。

不一会，从上屋推出来一些人，身上打得血淋淋的。我害怕，躲在我妈的身后，从我妈的胳膊缝里偷偷地往外看，看见这些人中有我们邻居王大爷。日本官（后来知道他姓山口）对着大伙哇啦了一阵，李翻译又说了一遍，意思是他们“通匪”，把他们处死。大院的东南角上有拴马桩，拴马桩底下放着板凳子。日本守备队把他们架上了凳子，把绳子一头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另一头绑在拴马桩上，然后，把凳子踢倒，他们就活活地被勒死了。王大爷的舌头伸出挺长，把我吓得使劲搂着我妈，院里的小孩都吓哭了。

下午的时候，守备队把抓来的一批一批地押出大院，没听见枪响。后来听说，那几批都叫守备队用刺刀给挑死了。到了日头快卡山的时候，日本守备队把院里剩下的老百姓都往外赶，有些人不走，日本兵就用刺刀捅。80多岁的老寡太太，坐在地上不起来，日本守备队当时就用刺刀给捅死了。

到了东山根，看见了先前那几帮老百姓都死在乱坟岗子上。我们这帮人多，乱坟岗子站不下，就站在旁边的苞米地里，苞米苗挺高了，都给踩倒了。旁边的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山腰上还架着机枪。我妈一手拉着我嫂子，一手拽着我，脸朝山站着。有的人想跑出去，一跑，就叫日本兵开枪打倒了。还没等对我们开枪，我妈把我拉到她的前面，等机枪一响，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就觉得肋巴火辣辣地痛，我用手一摸，是肋巴受了伤，直淌血。我爬起来，看见我妈的脑袋炸碎了，我嫂子炸开了半拉肚子，日本兵多狠，用的是“炸子”。我跪在地上，抱着我妈的尸体痛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呀，你不管我啦？我可怎么活呀？……”

正在我哭的时候，听到那边一个小孩叫我：“姐姐呀，你也

没死啊？咱俩一块跑吧！”我听声音是老关家的小子。他走到我身边，拉着我的手说：“别哭了，姐姐，快跑吧！”我们俩顺着苞米地往东跑，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我掉到大沟塘子里，不省人事了。等我又苏醒过来的时候，喊姓关的小孩，怎么喊也听不到他的回声。那沟很深，爬了好半天才爬上来，等我上来的时候，姓关的那个小孩已经走了，我再也没见着他。

爬过了岭就是小蚊子沟，我遇到一位老大爷，我问他上白家堡子怎么走，他说：“孩子，你才从死人堆里逃出来，你可别回去，叫日本人再抓住，可就没命了。”他要留我先住下，我不听，一心想回家看看。

我顺着沟往下走，一直走到河套，在河边上洗了洗脸，歇了一会儿，又顺着小河往上走，遇到了小桥，知道快到家了，爬过了桥，伤口痛得我直不起腰来，我一步一步地往家爬。也不爬了多长时间才到家。进门一看，屋子里空荡的，没有一个人影，只有小猫还趴在炕上“咪、咪”地朝着我叫唤。我想起了死去的妈妈，想了死去的嫂子，心里就像堵上块石头，我爬上了炕，打着滚放声在大哭起来……

（通化县政协供稿）

日军血洗白家堡子目击记

胡乃千

1936年，我在通化县大荒沟学校当校长，耳闻目睹日本守备队血洗白家堡子的血腥罪行。

这一年的农历五月初，我抗日联军在雷家沟一带伏击击毙

日守备队 11 名。日本守备队气急败坏，调兵遣将，在白家堡子方圆 50 余里实行“治安肃正”、“归屯并户”。

日本守备队首先严令柳河县孤山镇警察署长、村公所的村长、当地驻军的连长等，限三日内修成三通河桥，否则“拿头来见”。伪官们立即召集孤山子所有的木、瓦、石、铁匠，外加民工数百人，在鞭、棍的威逼下 3 天 3 夜抢修完三通河桥。接着从三源浦、山城镇、朝阳镇等处调集日本守备队 100 余人，由中山大尉率领，外带一个营的伪满军队，前往大荒沟“剿匪”复仇。

那一天，大荒沟飞土扬尘，天昏地暗，18 辆汽车载着百余名日本守备队，气势汹汹，一直开到大荒沟街。他们把警察署大院强行占用。警察署署长赵德清只得领着部下住在街上的商店家。一个营的伪军，也分散在商店和老百姓家。街上除了兵还是兵，闹得人心惶惶，气氛十分紧张。

金川县政府的日本参事官和指挥官，也都先后来到，他们带来一些粮食和日用品，表面上是来安慰老百姓，实际上是稳住民心，怕老百姓外逃。

在这期间，中山大尉通令警察署长赵德清派密探侦查抗日联军去向。但一连几日，也没探出一点抗联的音信。中山大尉气得要死，自己派守备队到处搜索，前后共绑来 30 多个所谓“嫌疑犯”，用毒刑逼供，也没逼出消息。

最后，把这些绑来的所谓红军，有的被脱去上衣绑在警察署大院门前的大树上，然后，守备队士兵一个接着一个把他们当刺枪术演习的靶子，用刺刀乱刺。被刺的人要是叫骂，他们就往嘴上刺，直到刺得血水淋漓，肉如烂酱，方才罢手；有的被绑在树上，守备队士兵牵出狼狗，叫狗扑上去噬咬，直到咬死为止。类似这样的残暴行径，那几天几乎每天都发生一两次。

日本守备队中有一个小翻译，姓金，复县人，19岁。那时我是22岁，刚刚教学。我俩都没脱掉学生气，他和我很投缘，因此，他时常到我学校来玩。他告诉我：中山大尉探不出红军的消息，无法泄愤，因此，他下了决心，抓不着红军报仇，就杀老百姓出气。

中山大尉开始行动之前，小金翻译又来到我学校，见他一进门就坐在椅子上，紧皱双眉，默然不语。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也不吭声，只是两眼紧紧地看着我。隔一阵，他长出了一口气说：“不好啊！”就又不往下说了。经我一再追问，他才讲：“今晚守备队只留十几个人留守，其余全部出发，不带满军。”说剩这，他就不再说了，我这时也领会了他言外之意。他临走时，还回头叮嘱我千万别往外说。他去后，我心中更觉得烦躁不安，晚饭也没吃，在办公室内就合衣而卧。刚要朦胧入睡，小翻译全副武装，慌慌张张跑来，他进门就说：“今夜，老百姓要遭殃了，你晚上千万别出门，不要对别人说。我就得走，那边都站排啦！”

这一夜我也没有入睡。天将亮时，就听到有许多人的脚步声，由远而近，那声音越来越大。我搬出房门，从院中往南边大道上细看，只见一些穿黄色衣服的守备队士兵，押着身穿各色衣服的老百姓，黑压压的，约有数百人，正往回走。走近时，看得更真切，这些被押解的人，男的女的都有，有白发苍苍的拄杖老人，有怀抱婴儿的妇女。他们都被赶进守备队住的大院中。我这时联想到小金翻译的话，心绪实在无法宁静下来。

据以后小翻译对我讲：他们出发一直走到南岔沟里，回过头来，就开始各沟各岔逐户搜人，能走的带走，不能走的老人和病人，就一刀刺死。因天将拂晓，老百姓有的起早上山干活，看不见的就算“便宜”啦。有的家早饭都做好了，没等吃就全

被抓来。

下午，我在学校突然听到守备队大院内传出“救命啊，救命啊！”的惨叫声。以后，据小翻译说，那天活开膛8个人，拿出心来祭灵。

那时，大荒沟街人心惶惶，因为抓来的这些人中，有的是亲属，有的是朋友，都急欲想法救出来。于是就请警察署长赵德清恳求日本参事官和指导官到守备队去说情，理由是，有些人是警察家属，有的是自卫团家属等等。

日本参事官和指导官答应了。当参事官、指导官走到守备队大院门前时，中山大尉竟不许入内。这可能是他们预先定下的圈套。

日本参事官、指导官碰壁后，百姓又苦苦哀求伪满军队的营、连长们前去说情，营、连长们也怕遭拒绝，但出于民族意识，他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硬着头皮，来到了守备队。

这回中山大尉给了好大个面子，允许伪军营、连长们入内，寒暄数语，说聊来着。中山大尉很阴险狡猾。他怕不答应营连长们的要求，惹起众怒，发生兵变。再说，大荒沟街地形对于守备队也不利，因为东面山上有五个炮台，全是伪警察驻守，居高临下，打守备队这个大院象往井里打枪一样，这300来个守备队，还不得全部“报销”。想到这里，他主意一定，便狞笑了一声说道：“好的，好的，营长来了，要的一定是要好人，都要哪个？都叫什么名字？快快说出来，叫翻译按名找出来，你们就领回去好了。”

小翻译找来找去，共找出20几个人。营长又要求中山大尉把一些小孩也放出来，中山大尉没有答应，营长没法，只好同三个连长领着被救出来的20余人，心情沉重地走出大院。

这些被救出来的人对这几位营、连长千恩万谢。可这几位

营、连长只是两眼看着他们，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从屠杀的那一天，阴雨绵绵，我站在角隅雨雾中，不时向守备队的大院门口望着。只见先由20多名守备队士兵，有的手持上刺刀的步枪，有的提着战刀，从大院中绑出18名小伙子，顺着围墙往东走到东山脚下。日寇都拔出战刀，意思是想砍死这些人。这18个小伙子一看要杀他们，便不约而同地一股急劲挣断绑绳，分头就跑各自逃命。守备队士兵也慌了神，端枪就打，最后一个也没打中。

第一批这样跑掉，紧接着是第二批。第二批被杀的人就多了，男女老幼都有。其中有8个人各背一个“死尸”（可能就是被活开膛取心的人的尸体）。

这回守备队士兵不用战刀砍了，他们叫被抓的人都跪下，架起了4挺机枪，一阵扫射，这些无辜的同胞们就一排排地倒下去了。

在第三批被屠杀的人群中有一大个子的中年人，上身穿一件蓝布上衣，还补了几块“补丁”，下身穿青色便裤，站在那里。日本鬼子叫他跪下，他就骂起来（听声音是个山东人），痛骂守备队的祖宗亲娘。这时，从后面过来一个鬼子兵，照他后腿腕踹了一脚，嘴里骂着叫跪下，但没踢倒，他骂得更起劲了。从前面又过来一个日本兵，用刺刀照他嘴就刺，他一扭头，刺在面颊上，血立刻就淌下来。这个山东汉子，突然猛地一脚把鬼子兵踢倒。这时另一个日本兵举起战刀，从后面向这个山东大个子的头部砍来，头立刻被砍掉“半拉”，一股鲜血冲出半尺来高，他倒下去了。我看到这里，禁不住自己哭起来。

还有一个青年妇女，穿着很褴褛，披头散发，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约三岁，吓得直哭。来了一个鬼子兵，一把就把孩子夺过去，扯起小腿，往一棵大树上摔去。只听“呀”的一声，脑

浆迸裂，小胳膊小腿小手还在抽动。他妈哭闹抢夺也来不及了，被鬼子一脚踢倒，扑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哭叫……。今日追忆当时情景，我心犹自悸恸难已。

在守备队对村民进行大屠杀时，在大道上有两个小孩儿，一男一女一前一后，顺着往南门外家里跑，也被守备队抓住混在人群中给枪杀了。

那天夜里，在被屠杀的人群堆里，有的没打着，有的受了伤，都趁夜爬起来跑了。有一个李忠昌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第二天，警察才领着民工掩埋了这些尸体。夜间，北岔和大荒沟街的老百姓，多数都舍了家产或只留一个人看门，其余的都悄悄地扶老携幼，连夜往柳河县孤山子和通化县光华等地四散逃命。我也放弃校长职务，移居到通化县城。

（通化县政协供稿）

日寇血洗大獾洞

郭闻奇

这件惨案迄今已过去整整50年了。我虽未亲历此事，但在1966年我曾去獾子洞采访找到当时健在幸存者林希恩老人和受害者崔占江的爱人及一些其他知情者，故记忆犹新。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但抗日烽火在全东北频频燃起，抗日义勇军和抗联经常出没在松花江两岸。处于扶余县东北部的大獾子洞屯，恰与松花江北岸义勇军和抗联活动的“三肇”一带，隔江相望。同时，这里也

经常有些土匪来此骚扰，因而日寇对这一带十分注意。

1936年旧历九月二十四日（阳历11月7日）这天傍晚，从哈尔滨出来追剿抗日队伍的日寇，抓到一名“土匪”，供认他常在大獾子洞屯地主邵焕章的网房子吃住。于是，日寇便断定，那网房子一定是抗日队伍的集散地点，便决定前去“剿匪”。

日寇先派一个少尉带领三十多名鬼子兵，渡江前往邵焕章网房子搜查。正巧，那天网房子里，“天助”胡子匪首任义军等几个胡匪在吃夜饭，抽大烟。鬼子侦察兵走进网房子时，屋里的胡匪惊慌失措，匪首任义军急忙搁下烟枪，拔出手枪隐在门后，另几个胡匪则藏进网房下面。还没等鬼子进屋，任义军便来个先下手为强，开枪击毙了他们。他万没料到，还有许多鬼子隐藏在后边。这边枪一响，外圈的鬼子立刻集中火力向网房子猛烈扫射，并且又向网房子附近一个居民院崔善江家频扔手榴弹，炸死3匹马，将在屯里抓来当向导的老宋头也给打死了。

激烈的枪声过后，匪首任义军被打死，另外几个跳墙逃跑了。

日寇找到2具日本侦察兵尸体，又在屯里抓人派车把尸体拉到伊家店警察分驻所，将尸体往办公桌上一放，吹胡瞪眼，大发雷霆，迫令伪警察低头向尸体默哀。

这天夜里，一个血洗大獾子洞的阴谋便策划好了……

第二天鸡刚叫，日寇就联合当地自卫队黄十老三的排子兵，向大獾子洞开拔了。

这大獾子洞共有40来户人家，除地主邵焕章外，还有3户富农，其余全是本地和外地来给他们扛活的长工。他们昨夜受了一场惊吓之后，人心惊恐。有的知道鬼子非来报复不可，早跑了，有的自以为是一清二白的穷庄稼人，鬼子不能那么没人性，便留了下来，地主邵焕章明知道这事与自己有点牵连，但

匪首任义军被打死，其余的也逃之夭夭，没人会揭发他。他怕伙计一旦都走掉，场院里堆放的粮食可就没人经营了。又依仗他与警察平日有交情，于是，他便指天发誓，向伙计们担保没事。

话没说完，日寇进了屯，大肆搜捕抓人。他们让黄十老三的排子兵把全屯男人都骗出来，到屯东头听皇军训话，来一个绑一个，一边绑一边咒骂：“统统的是红胡子！”

一共绑来了49人，又用缰绳把脚也捆上连成一长串，押到了屯后一条3尺多深的壕沟旁边。

这时，地主邵焕章穿上了貉绒皮袄，自以为能以绅士的身份替乡亲们说情，到日寇面前鞠躬作揖。谁料日寇根本不听他这一套，把他打了一顿棒子后，也和大家捆绑到一块儿。

秋末冬初，沟里积着白雪。日寇用枪刺把每人的帽子都挑了下来，刀尖把人的脑袋划破，血流满面，然后用枪托毒打，人们互相挤着，横躺竖卧倒在沟里。

这时，日寇在屯里又把妇女、儿童全都从屋里赶出来，随后把房子点着，刹时火焰熊熊，哭喊声震天动地。有的回屋抢东西，被大火烧焦了头发、烧伤了脸，有的被烧断的房木砸伤……一幅凄惨景象，不忍目睹。

日寇将妇女、儿童赶到屯西头一个大粪堆上，让他们亲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毁灭，在一旁疯狂地大笑不止。然后，又把他们赶进西房里，周围堆上谷草，用大车把门堵上，准备烧死。

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伪扶余二十九团驻长春岭骑兵三连，闻讯飞马赶来，见全屯一片火海，关在屋里的老人、孩子、妇女拥挤在窗前拼命哭喊，持枪看守的鬼子正待焚烧。目睹这残忍的景象，立刻激起他们的民族义愤。连长鄂德升当即通过翻

译向日寇少尉排长申明：老幼妇女是无辜的，不应该对他们下毒手。这时，伪军也都端起枪来，向日寇怒目而视。在这种情况下，日寇自己人少，恐一时鲁莽于己不利，便答应释放妇女和儿童。骑兵连一些人，急忙上前推开了堵门的大车，抱走了谷草，妇女和儿童一见获救，慌忙跑出屯外。

狡猾的日寇恐伪军再来干预他们去屠杀屯后沟里的49人，便假造敌情，说东邵家有土匪，让他们去堵击。

这支伪军迫于日寇的淫威，不得不垂手俯命，乖乖去了东邵家了。

日寇支走了骑兵连，便来到屯后的壕沟旁。

这时，倒在沟里的男人们，从早到晚，挨了一天饿和冻，又见屯里火起，阵阵哭声传来，知道房屋被烧，家人被赶出去，心里更加难过和愤怒。有的人轻轻解着绳子，准备逃跑，被警戒的日寇发现，踩着身子，劈头盖脸地一顿乱打，当场打死一个80多岁的老赵头，鲜血染红了雪地。

日寇来到沟旁，首先要把“网户达”（网房子的东家）拉出来砍头祭灵，当鬼子问谁是“网户达”时。一个叫傅有才的地主以为鬼子要对“网户达”开恩，便笑嘻嘻地承认自己是。鬼子不问真假，把傅有才和另外两个人拉出来，迫令他们跪在用白布包裹着的两具日本鬼子尸体面前，拔出战刀，砍下了他们的头，刹时鲜血四溅，尸体倒在血泊中……

日本鬼子把这3颗人头放在鬼子尸体旁边，又叨咕些什么。祭完灵，他们架起了机枪，对准倒在沟里的中国村民，一阵疯狂地扫射，哭叫声惨不忍闻。

血，象道道泉水喷溅，刹时沟底变成殷红的小河，那邵焕章也未逃出魔掌。

日寇唯恐还有活着的，又跳到沟里，踩着血淋淋的尸体，逐

个查看，发现有没断气的，就用刺刀再扎，扎完后，又让排子兵从屯里抱来豆秸堆在尸体上，点火焚烧……

日寇望着熊熊大火，闻着烧焦的腥味，狞笑着，发出野兽般的嚎叫。

当时，有人躲过了枪杀和刀刺，却没躲过火焰的烧灼，白连海的哥哥被烧得实在难以忍受，气愤至极地跳了起来，对日本鬼子破口大骂，被一枪击倒。董老八也没躲过焚烧，刚要翻身，被鬼子发现，刺了几刀，当即把肚子挑开，内脏都淌了出来，惨叫着死去。

浓烟卷着火舌，一直烧了两天。空气中飘散着窒息人的血腥味，许多尸体被烧得皮肉模糊，辨认不出原样，那沟里的青烟，仿佛缕缕中华民族的不泯灵魂……

就这样，一个曾有40多户的小屯落，在日寇的铁蹄下成了一片焦土。

日寇在这里发泄完了兽性，便带着自己那两具尸体过江回哈尔滨去了。

28年后的盛夏，笔者曾有幸访到了獾子洞惨案中的幸存者73岁的林恩老人。他当我沉痛地讲：当时，他身中七弹，左肩胛骨被打碎、腿被烧伤，他就用手抠泥往腿上抹，一直挨到日本鬼子撤离。可是，大火越烧越旺，他便不顾一切地拖着断了的左臂用右臂拐着，艰难地爬到沟沿上，拼命往北边的苞米地里爬，与他一起爬出来的还有崔善江。两个人刚跑不远，就被鬼子发现，幸亏天黑，没打中。林希恩急忙钻进了苞米地里，崔善江钻进身边的尸体堆里，射来的子弹全打在尸体上，才算侥幸逃出。但是，到1943年他又被抓了劳工，不到20天便死在了劳工工地上。

这就是日寇血洗大獾子洞的一段血腥历史，国恨家仇是不

可忘记的。

(松原市扶余区政协供稿)

钱家惨案的真相

王富春 口述 王喜荣整理

日寇侵占东北时期，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爱国抗日斗争，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血腥惨案，屠杀了千千万万的爱国同胞和无辜群众。“钱家惨案”就是他们残酷镇压的一个历史见证。那时我在伊通县伪警务科特务系任职（警长衙，当时昌图县北半部、沙河子以北属伊通县管辖）参与了钱家惨案的“侦破”活动。虽然事情过去了整整50年，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于7月21日后半夜，我在家被伊通警察署西门派驻所来人叫醒，要我立即到县警务科报到。在伪满时期，夜间外出抓人那是常事，我以为又要去捕人，便匆匆地来到警务科。到那一看有些诧异，门口停着一辆汽车，司机高锦已经将汽车引擎发动起来，有十多个人正慌慌张张地往车上爬。我仔细一瞧，有伊通县警务科日本首席指导官兼检察官村上义一（警佐衙）、警务科翻译刘春田、伊通警察署特务系警士李奎锋、王守信，还有警务科卫队10人，共15人乘坐汽车离开了县城，向西驶去。

• 本文作者王富春，伪满时1934年至1945年，在伊通县警务科任职，曾参加此案调查。解放后被判刑，刑满释放后，现居住长春市南关区。

车刚一出西门我就问身旁的刘春田，去执行什么任务？村上不叫打听。我们这些人都闷坐在车上，思索着，猜测着。车速很快，1个小时就到达公主岭车站。此时，在铁轨上停着一辆烧清油的小火车，我们立即下车改乘这辆小火车。刚上车，车轮就启动了，往西开去。车过郭家店、十家堡、四平等站都开绿灯放行。大家在车上暗暗嘀咕着，车早就过了伊通界，怎么还不停呢？车到牤牛哨天已放亮，到泉头站才缓缓停下来。

泉头警察署长张致远、署副日本警尉猪骨左右卫门早就在车站等候，我们一下车他们就把我们领到满井警察分所。我们会同分所长张肇让等人来到沙河子。沙河子是一条界河，东西走向，河的北岸归吉林省伊通县所辖，河的南岸是归辽宁省昌图县所辖。沙河子距满井分所有二里多地。我们到达河岸瞧，大吃一惊，一列客车被颠覆在沙河子里。沙河子上面有座铁桥，距水面有十多米高。列车是从桥上翻到水里的，机车头砸入河底有一米多深，连同五节车厢都泡在水里。在铁轨上还停着三节幸存的车厢。肇事现场早已被封锁，在铁路的两侧，头一层是铁道警护队，二层是宪兵，三层是警察。他们都是从南满线的警护队和四平、昌图、开原、铁岭等地宪兵团和警察署调去的，有好几百人维护现场。

我们到达后，带去的十名卫队也布置在铁路的两侧。我和刘奎峰、王守信身着便衣在附近看守。村上义一和刘春田同首都新京宪兵司令部派来的日本军官联系。宪兵司令部派来一名特高课长（少佐衔），是个小个子日本人，长相很凶，由他指挥这个案件的“侦破”活动。

这时，我向别人详细地询问一下事情的经过。原来这是21日从新京（长春）开往大连的“鸿号”急行客车，载有数百人，凌晨12点零3分到达沙河子铁桥时，突然列车脱轨，从十多米

高的桥上翻到沙河子里，旅客多数是日本人，内有一名日本少将，还有少数日军。车厢里的人死伤累累，即使没有摔死，也被河水淹死了。机车上的司机和员工都被烫死了。那个日本侵略军的少将也被摔死，日本兵几乎没有生还的。在我们到达前，从四平开来的不少救护车，把伤亡的旅客一批批拉走了。我们到达时，见铁路员工正用嘎斯火分割车的衔接处，到中午才把机车和车厢分割开。这时从四平开来一辆重型机车，带一个重型车厢，上边拉着一台长臂吊车，把机车叨放在车厢上，就往四平开去。

午后，我们开始了“侦破”活动。我到现场一看，原来在距桥北不远的两根铁轨接头处，铁夹板的螺丝被拧了下来，道钉也被拔掉了，道轨完全失去了控制，导致列车颠覆脱轨。

我们向泉头警察署长张致远和满井警察分所长张肇让了解情况，他俩没提出任何线索。我们三便分头搜集情报，两天毫无收获。村上义一把我们三人拽去，他瞪着血红眼睛吼着：“你们这些废物，都两天了还没有查到线索。让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把我好一顿训。他说案件发生在伊通管辖范围内，命令伊通警务科限期破案。你们三人要通力合作早期破案。”过了一天，乐山警察署长陈久香突然来了。他是泉头人，中等个，大眼睛，穿着灰串绸衬衫，戴着从香港进口的狼草草帽，拿把小伞，冷眼一瞧像个阔商人，我们一问方知，是村上给他去电话，要他来参与破案工作的。陈久香原是营城子警察署长，1936年末，他曾把小杂木沟分所搜捕出来的两名地下党员，送给日本宪兵队，使敌人破坏了伊通地下党团组织，使不少人遇难。他的行径深受日本人的赏识，并通令嘉奖，颁发奖金。这次村上叫他登台，定然没有好戏唱。

果然，陈久香来后根本不同我们在一起进行“侦察”，独来

独往，经常同村上嘀咕。又过了一天，村上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叫汇报情况，我和李奎峰、王守信都没有提出新情况，可陈久香却后来居上，他说据掌握的“情报”，这个案件是钱丰泰、钱富泰两家唆使铁路员工干的。钱家是张学良的亲戚，他说在铁路员工家搜出了扳子，是做案工具。

村上义一向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汇报后，7月24日，宪兵司令派了不少宪兵和伪警察，把西沙河子村团团围住，水泄不通。他们把两家老钱家从12岁以上到72岁以下的男人都逮捕了。有个5岁的男孩，因去姥姥家串门才得幸免。在此之前，敌人就把满井车站的铁路员工全部逮捕。他们说是先从内部破案。其中有一位铁路员工叫王山东被捕后，泉头警察署的警察王志民和1名日本宪兵，去他家搜查，要他妻子交出道钉，并威吓她交不出道钉就带走，同她丈夫一路去。王山东的妻子不用说找出道钉，连一个铁钉都没找出来。

王志民和宪兵走后，王山东的妻子抱起她那3岁的娇儿痛断肝肠呼天喊地大哭一场。她左思右想没有活路了，走到摇车杆子眼前，先将孩子吊在摇车绳一端，自己吊在另一端，这位年仅20岁的妇女和她那只有3岁的婴儿，被敌人逼得双双自尽。我们闻讯到达时，他们母子早已绝气身亡。她被勒得双目突出，眼角流血，脸色发紫，舌头伸出多长，嘴角上血水滴滴。那个婴儿更是惨不忍睹，张着小嘴，嘴里边含着被勒出来的黄瓜和小米饭。围观的人们看到如此惨状都唏唏嘘嘘，抽泣声一片。我虽然是伪警察，但还有中国人的良知，见到他们母子惨相，不由自主地鼻孔发酸，眼睛发湿，泪水几乎都流下来。

敌人在老钱家、满井车站和西沙河子村共抓去28人，送到四平宪兵队和伪警察署关押。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严厉审讯，施以各种酷刑，要他们承认这起案件是张学良将军派人策划的。

人们心里都明白，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在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是由十年内战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而“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因此，敌人对张学良将军恨之入骨，妄图通过这一事件打击张学良将军在东北的原有势力，进一步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敌人从被捕人的口里，是根本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供词。于是血腥的屠杀开始了，8月24日敌人把被捕的人，用汽车拉到四平气象站墙外，推下汽车，驱赶到早已挖好的深坑里，加以杀害。

敌人在处死那些被捕者以后，对西沙河子村，仍然进行封锁，老钱家的牲畜全部饿死，有的亲属也受牵连。老钱家在北平有个大学生，时值回家度暑假，听到他们家遭到惨杀，就逃往佳木斯。敌人获知后，就派泉头警察署的警察王席珍和一名宪兵，去佳木斯搜捕。把这名大学生抓回来后也送到四平，后被处死。这场惨案先后被敌杀害的有23名，有2人自缢，共有25人被他们夺去了生命。

案件结束后，我才回伊通。在这20多天里，一幕幕惨剧，令人发指，日本军国主义者残暴罪行，罄竹难书。

（摘自《伊通文史资料》第一辑）

钱家惨案

庄光烈 尹永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发动事变，进而占领了整个东北。从此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践踏下，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东北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的

爱国运动，反满抗日事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它在东北的反动统治，采取了法西斯血腥镇压，惨无人道，罪行累累。钱家惨案就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见证。惨案是1937年发生在离我市不远的泉头车站附近，而杀人刑场就设在我市铁西区气象台和原第八师范学校的西侧的一片荒草地上。当时在第八师范读书、现已离休的庄光烈、张霖、张汶田老师就是这起惨案刑场的目击者。

事情发生在1937年旧历六月上旬，阴历7月21日零时30分，由北往南行第16次急行列车，驶到泉头车站南边2公里，沙河子大桥地方，路轨破坏，火车脱轨；车头同3辆客车车厢一齐掉在桥下沙泥中，其余车厢也东倒西歪，车里旅客多是日本人，死伤无数，狼藉不堪。这就是满铁京连线火车颠覆事件。

日本侵略者气急败坏，对中国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当时，日寇调动四平、日本宪兵队、四平警察署、开原、铁岭宪兵队和警察署等倾巢出动，大肆搜查，以逮捕“破坏分子”为名，到处抓人。7月24日，日寇突然包围了沙河桥东的西沙河子村，逐到钱国泰等两家，翻箱倒柜，大肆搜捕，将男子全部捆上，大打特打，向妇女们逼问破坏铁桥铁轨的口供。硬说：“这一定是张学良派人来指使你们干的，还是承认的好”。原来钱家是张学良先生夫人于凤至的姥娘家，家中有在东北军当旅长的，村子距大桥又近，所以就使日寇怀疑，招来抄家大祸。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日寇终将钱姓逮捕9人，村里、钱家亲友、满井铁路职工逮捕13人，共22人。当即把他们带到四平日本宪兵队和警察署关押。在看押中，每日严刑拷打逼供，什么灌汽油、灌辣椒水、坐电椅子……施尽各种残暴手段。最后，折磨得全身四肢不能动弹，不能吃东西。7月24日午后，天空阴云密布，日寇用大卡

车将 22 人载到气象台西侧，第八师范西墙外网球场旁，这里早已挖好一个大坑。日寇把用铁索连在一起的 22 人，从车上拉下来，跪在土坑前，其中有老头、老太太、中年男人、有穿着制服的青年学生、还有抱着小孩的妇女，全都用布蒙着眼睛堵着嘴，一字排开跪在坑边。日寇刽子手和伪满警察拔出战刀，先在草地上挥舞试刃，喊着杀声，然后就像发疯的野兽，用战刀把受害者一个个地砍倒在地坑里，血花四溅，然后用脚踢入坑里，随即掩埋了事。这种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西沙河子村在捕走人以后，仍被封锁月余，禁止出入。凡本村外村与钱姓有往来关系的亲友，无不受到牵连，家里牲畜全部饿死。钱家只剩一个小孩，因住姥娘家幸免于难，隐姓埋名，以后逃往朝鲜。直到解放后，才返回故乡，向人民政府诉苦，终将当年的汉奸翻译陈顺五逮捕枪决。

钱家惨案距今已 50 年了，这些受害者仍含冤长眠在地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日本法西斯分子曾惨无人道地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

于凤至亲属谈“钱家惨案”

钱金宝 钱金仲口述 姚野整理

1937 年 7 月 21 日凌晨，伪满连京线一列日本军用快车，由北向南急行在昌图县沙河子铁桥处突然颠覆。这次军列被颠覆，使侵略者遭到重大伤亡，三昼夜未通车，事件震惊中外。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报复，将沙河子村钱家及有关人员 23 人杀害。现

将钱家惨案追记于后。

我家祖居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现属辽宁省昌图县）满井乡沙河村。旧社会家有土地百垧，60多口人团聚一堂。祖父钱丰泰是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第一夫人于凤至的舅父。家父钱辅廷（字东升）过去是张大帅的马弁，后为张学良将军的侍从副官，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家族中在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内就职的就有7人之多。最高职的钱忠山是东北军1名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腐败无能，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实行不抵抗主义，奉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往关内围剿陕北根据地，竟把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让给日本。张学良东北军的上下官兵，面对国破家亡和国共两党的不同主张，思想不断变化，由疏共变亲共；由亲蒋变恨蒋，因而导致接受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将军亲自召见于凤至夫人的表兄钱辅廷。让家父待机破坏东北铁路运输线，切断日军向关内增添兵力和弹药给养的供应；并做好东北军重建家园的内应工作。为了给钱辅廷创造方便条件，不致暴露行踪，便下令钱辅廷接任石家庄东北军的营长职务，既避开了钱张之嫌，又好来去自由，行动方便。当蒋介石在南京扣押张学良不久，家父收到表姑母于凤至的一封密信：告知“西安事变”真相，并说蒋还要逮捕学良一派及其至亲密友，为免遭暗害，应换个地方躲避一下。不多日，我家就由石家庄迁往天津市。在此期间，家父积极筹划，后直接派人传递了张学良将军的密令。正如敌伪报刊上所说：“本年逃亡关内之钱家某官，行反日之行动，由此人向钱家来信，传达日支风云之险恶，如果事变时，在开战之同时，满洲内之铁道使其破坏，力谋后方之扰乱”。这里提的

某官，正是钱辅廷。家父就是张学良将军的代言人，遥控反满抗日救国的主要组织者。1936年冬，家父密派王氏弟兄（外号王山东）去东北昌图老家传递张学良将军这一密令。为使王氏弟兄能在老家落户，又不引起他人怀疑，经过细致研究，慎重考虑，周密计划，才让王氏弟兄领妻子和孩子一起4人以逃荒为名，前往昌图老家与钱富德（五叔）接头。通过密信接通了关系，被收留为我家短工，安排在我家下屋居住。后因钱富德秘密串联族兄族弟——钱富恩（当时是满井站铁路警察）、钱富祯、钱富厚等弟兄，钱富德便成了这次事件的直接组织者。于是秘密决定，扒铁道破坏运输线。一是自家西南方不远的满井河铁桥；二是桓沟子车站。事后积极筹备，扩大队伍。钱富恩和满井站铁路3人郭孝田、蒙希山、蒙希武是拜把兄弟，患难朋友。不久挂钩成功，队伍已扩大到9人，若从事扒铁道，破坏运输线，必备工具，又要有熟悉技术。工具由郭孝田、蒙氏弟兄包下了，撬杠、铁镐、搬手等，应有尽有，准备停当，只等时机一到，即可行动。

偏巧，7月18日从满井站获得内部消息：“20日夜间将有日军特快军用列车，由北向南通过满井站，要做好线路安全检查工作。”他们便秘密商碰，研究破坏大计。钱富德召集众人，共同讨论研究，周密考虑策划。得知20日夜间10点以后南北方向均无车。当即决定于20日晚10点携带好工具到现场，由钱富德指挥。钱富德、钱富厚南北站岗放哨，钱富恩、郭孝田、蒙氏弟兄和王氏弟兄人人做扒轨工作。他们正是准时到达满井河铁桥的北端，动手将铁轨接头处撬开，使接头处不相衔接。完毕后，郭、蒙、王各回各家，钱氏弟兄沿铁道向泉头方向走去。

21日零时30分，由哈尔滨开往大连的日军用特快十几节车厢满载日军官兵，火车驶到铁桥北端突然脱轨倾斜，车头向

河底冲去，后面车厢由于惯力，冲撞着也跌入河底，火车头扎入河底泥里，仅尾部一节车厢脱轨后停在桥上，其它车厢，全部车毁人伤，敌人死伤惨重。敌伪报刊上说：“死去日本机关士（司机）2人，满人2名，日本旅客1人，负伤64人。”这是避重就轻、怕暴露真相，掩人耳目之说。事后听说日军将官以上的高级将领就有4名当场死亡。

事件发生后，经过现场检查，敌人认为：“此事件非自然发生之事件，乃大胆之徒，行其计划，故意破坏之所致也。”因而调集警宪特务汉奸，封锁各个要道，严查可疑之人。敌人考虑到，破坏时间之准确，工具准备之恰当，扒轨工作之熟练，必定是车站内部人员干的。首先抓走了蒙氏弟兄，后又抓走了郭孝田、钱富德、钱富生。而钱富生是刚从奉天（沈阳）放假回家的大学生，事件发生时还在学校，根本与他无关，虽然日系校长当面申诉和具保，但敌人嫉妒该人是大学生，恐出后患，也未能幸免于难。钱富德、钱富生弟兄2人是我二祖父的儿子，哪里肯舍，二祖父便不顾一切地由小路赶到泉头警察署打听消息，未曾想也被扣留，一去未归。随后又抓走了祖父钱丰泰、五爷钱景泰和叔叔钱富安、钱富厚等人。三叔钱富桢跑到此路乡女儿家时，谁知早有特务等待，也被抓走。伯父钱富清逃到昌图城姑丈人曹义家里，也被告发让警察抓走了。不仅钱家满门遭劫，还祸及亲友，表叔徐氏弟兄3人，王氏弟兄和许某等人，也一同送往四平市日本宪兵队。后全部定为“反满抗日罪犯”，于当年8月24日集体砍头埋在四平市南公园墙外。主要组织者钱铺廷曾几次迁家，后由天津迁到北平市北新桥香饵胡同三十六号居住。1939年夏一天晚上，身着便衣、手持武器的特务5人，由房顶下来闯入屋内，将父亲和我姐弟，一共4人抓走，因母亲重病卧床不能行动，没有抓走。因我姐弟3人年幼，于第二

天凌晨用马车送回。而家父钱铺廷这个事件的主要组织者，由此杳无音信，后来才知被抓到北平市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惨遭杀害的。钱富恩老叔在火车脱轨完成任务回家后，马上偷偷带妻子从后院走出，投奔哈尔滨香坊区妻兄王世禄家。可是到后的4个钟头，全屯就被当地警察看管起来。后把一个姓洗的山东老头抓了起来。等昌图日本特务拿照片一对照，才知抓错了，因此钱富恩借此时机逃了出来，又逃往佳木斯，最后在哈尔滨满洲七八二部队当了装卸工，给日本侵略者在夜间往火车上装药箱。日本特务没有抓到钱富恩，临走时说：“谁抓到老钱家人有赏，抓到钱富恩，一斤肉给一斤金子，谁要知道不报，同样论罪。”钱富恩此时已改名徐荣久，因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在干活中经常把运往前方的药，全部倒地壕沟内，将空箱装上火车运走。后被日本侵略者查觉，于1940年6月被抓走杀害。到此，我钱氏一族祖辈3人，父辈8人在此事件中惨遭日本杀害。而八叔钱富春当时没在家，立即改名李志清，背井离乡8年，到处讨饭生活；大叔钱富云，吓得脱离红尘，留发蓄髯，出家于东丰县一个庙里，人称“刘老道”。二人在祖国光复后才敢回家，后正常死亡。

我钱家这一爱国行动所造成的惨案，记下了中华民族的深仇大恨和中华民族不可侮的铁的事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辈也能记取这一光荣的历史，为振兴中华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奋起腾飞。

（摘自《昌图文史资料》第二辑）

龙泉惨案

杜宝贵口述 宫玉梅整理

我叫杜宝贵，今年75岁，现住龙泉镇龙山村。每当回想起日寇践踏中国领土，对中国人民实行残暴统治，在龙泉残害无辜，害得我家破人亡的情景，我沉重的心情就无法平静。

记得那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大好河山。掠我财源，占我土地，杀我人民，欠下了中国人民笔笔滴着血和泪的帐。

龙泉处在朝抚公路咽喉要道。1931年就有红军在此活动，群众的反满抗日情绪很高，曾协助红军两次攻打龙泉镇。并成立了大刀会等群众性组织，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经常给红军传递信息，送衣送药，日伪统治当局视红军为眼中钉、肉中刺。为割断军民的鱼水之情，他们采取了“集家归屯”、“保甲连坐”等政策，企图切断红军与人民的联系，并采取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

记得在1939年9月12日晚8点钟，由李金当向导，50名小鬼子和10多名背给养的老百姓，过老岭向龙泉方向而来。沿路烧杀。当他们来到龙泉西南2公里的木精株式会社（现龙泉酒厂，当时俗称“化学矿”）时，看到附近一茅草屋正冒着炊烟。杀人的欲望，使他们加快了脚步。

他们来到茅草屋前，翻译问屋里是否有人？我爹杜天才从屋里走了出来，翻译上下打量着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到屯子里住？‘挂条’了吗？”（“挂条”就是“集家归屯”后，

如有特殊情况，经当地警察署或警察所批准，查无“通匪”问题的人。警察署给以证明的条子，时称“挂条”。我爹是个胆小怕事、忠厚、老实的庄稼人。连忙说：“我是到这里看地的。”并急忙进屋将“挂条”拿出来递给翻译。翻译拿过“挂条”反复看了看，显出非常不耐烦的样子，将“挂条”扯得粉碎，扔在地上。然后，向日本官翻译了几句。只见日本官脸上横肉抽了几次，猛地抽出了战刀。其他日本兵蜂涌而上，七手八脚、不容分说地用绳子将我爹的左脚绑在右手上。然后，吊在了房梁上，下面堆起了我爹给别人割的柴草，一把火点着了，很快绑我爹的绳子就被烧断了，我爹挣扎在火堆之中，残暴的刽子手，用几个人抬的木头将其压着，活活将他烧死。

我和大哥杜宝金看到西山着起熊熊大火，立即跑到警察署，说西山起火了，不知什么原因，要求去看一看。经批准后，又到排长那取灯笼。灯笼，也是“保甲连坐”的产物，灯笼上写着你是几排的，排长叫什么名字。没有这种灯笼，把门的警察是不允许乱出乱进的。拿着灯笼后，我们就拼命地向西山跑。当跑到去“化学矿”的岔路口时，迎面跑来一个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们可千万别往那边去了，日本鬼子正在那里杀人、放火呢，你们现在去，不但救不了你爹，连你们自己的小命也得搭上。我是给日本人背给养的，其他人都被他们杀死了，我是趁他们不注意才跑出来的。”说完，就又没命地向前跑去。

我们哥俩没有办法，只得又回到屯子里。第二天，听说小鬼子走了。我大哥和邻居等8个人，前往出事地点，准备将爹的尸体收殓。我和其他人在家安排丧事，买菜、弄米、拢棺材。大约9点多钟，跟我大哥一起去的曲广恩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说其他人都被小鬼子给杀了。我一听，当时就昏倒在地。醒来时，我不顾一切地往西山跑，当跑到山上一看，小鬼子还没有

走，正在“化学矿”附近的松树林里坐着休息呢，并有说、有笑，根本没注意这边。我悄悄走到他们杀人的地方一看，就惊呆了。只见七八个人横七竖八、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我认出来有个叫贾七的老汉，脸朝外、眼睛还能“卡巴”。我看，他身上有七处刀伤，而且，都在腹部和肋部，肠子都看得很清楚，一喘气，血就顺着刀口向外流。我吓得直哭，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一想，光哭有什么用，如果小鬼子再回来，就连我也没命了。想到这，我就拣了些草和破衣服片子，把贾七的伤口一一给堵上。然后，把他拖到草甸子里，用草、树枝盖好，藏起来。

还有李喜峻大爷，被小鬼子用枪托将半个脑袋打塌，一只眼睛都掉出来了，搭拉在脸上。我见他还有气，就用件破衣服把他的头给包上，也把他拉到甸子里藏起来。

老罗头光能出气，不能进气。我大哥，刺刀从前心进去，从后心出来。手用绳子绑着，伤口还流着血，脸朝下。当我将他翻过来一看，鼻子没了，嘴唇子翻到了脸蛋子上。见此情景，我眼前一黑，就不省人事了。醒来后，又到烧我爹的地方一看，我爹被烧得只剩一条胳膊和一条腿了。

我偷偷回到村子里，找到东庙的陈老道，要了点刀伤药，弄了三只鸡，把他俩的伤口用干净水洗了洗，上了点药，把鸡毛拔掉，鸡皮剥下来，糊在伤口上，这时，伤口才勉强止住了血。由于老李头年龄较大，失血又多，伤的又是头部，刚给他糊上鸡皮，不一会儿，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敌人边走、边杀、边烧，来到了公路上，又见迎面走来了两位出家道人，魏老道和他的徒弟冯德林。这两位吃斋念经的道人也没免于一死。他俩全身被刺，被打得血肉模糊，脑浆溅了一地。

这帮强盗一路烧、杀，来到富国村附近的一家，主人赖老

六正在院子里干活。敌人进院后，二话没说，对准他胸部就是一刺刀。鲜血如注地从刀口喷了出来。他的儿子吓得哇哇直哭，残暴的敌人，一把抓过他不满6岁的孩子，活活摔死在一块大石头上。他怀孕待产的妻子，见此情景，不顾一切地拼命去保护儿子。一个鬼子端着血淋淋的刺刀，向其腹部猛力一刺，使劲一挑，肚皮划开一尺多长的大口子，随着一声惨叫，妻子当即死去。肠子和待产的婴儿掉在地上，接着鬼子又将微微抽动的婴儿挑在枪尖上，狠狠在摔在地上。然后，扬长而去，这种惨状真叫人目不忍睹。

后来听说，敌人从9月12日到13日，仅两天时间，就沿途杀害无辜百姓120余人，重、轻伤无数，这笔血海深仇，我终生难忘。

(靖宇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关于日本守备队 杀害陈八爷等一事

马文昌

亨通山子黑崴子屯陈八爷，系大刀会徐旅军法处处长陈德操（字惠圃）的父亲，是当时本地知名人士。他为人慷慨、乐于助人，在百姓中有一定威信。他因李洪玉一事牵连，被日本守备队杀害于柳树河子。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日本守备队听说黑崴子沟里有土匪，于是去讨伐。在马大望和土匪“双全队”相遇。双方接火后，日本守备队被打死两人，“双全队”撤退了。日本守备队马上追击，正遇上从山下来的李洪玉，李洪玉是仙人沟自卫团连长。日本人就说他是土

匪，把他抓到了县里。审讯时，他说亨通的陈八爷、张五爷、康二先生、周三爷等人都可以给他做保，证明他是“良民”。于是，守备队派人把陈、张、康等人传到柳河。

这些人证实李洪玉确实是仙人沟村良民，日本人仍然不信，仍对李洪玉动刑。李洪玉招架不住，供认自己“通匪”。

李洪玉这一供认，他的保人也就遭了殃。日本守备队对他们也严刑拷问。日本人用竹板子夹陈八爷的睾丸，夹一次，他就昏一次；昏一次就用凉水浇一次。陈八爷一看没个好，日本人不把他折磨死不会算完，不如认了吧，落个痛快。于是，陈八爷供认自己是“土匪”，日本人说，你是土匪，得报个字号。陈八爷报了个“老来好”，就这样定了案。其他人也都供认了“土匪”或“通匪”。从此不再审问了。

在一天夜里，日本守备队用汽车把他们拉到了柳树河子，在事先挖好的坑边，用洋刀砍了他们的头。

过后，他们的家属到柳树河子偷尸。因为是夜晚，也摸不清谁是谁，有的弄个身子，有的弄个脑袋，回家埋了。据说陈八爷埋葬时没有脑袋。因此事被牵连的26人，全部被害。

以上情况是我在黑旗子教书时，听吴玉峰讲的。

(柳河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侵华血史岂容篡改 ——日本侵略者在公主岭市犯下的罪行

刘金贵

我市前身原怀德县，在日伪时期，经受了14年侵略屠杀之苦，我们对日本文部省的倒行逆施行为更加义愤填膺！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关东军”的“铁道守备队”、“一部骑兵”、“通讯部队”就攫取了我公主岭、范家屯等铁道两侧的大片耕地，称铁道“附属地”。

日本“关东军”就盘踞在公主岭城东和城西北的铁道“附属地”内。日本的兵营不许中国老百姓靠近，附近的人行道也分日本道和中国道，中国人一旦误入日本道，日本兵就开枪射击。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十几年里，这样死难的中国无辜老百姓不计其数。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我市人民的镇压更加残酷。日本军国主义在公主岭增驻了大批“关东军”。城东面的原来日本兵营向东扩展到八里桥子，南面到6.5公里外的伊通县边界，还建筑了楼房仓库，驻扎了几万日本“关东军”和伪军；城西北增驻了高射部队；城西南修了许多营房和仓库，驻了战车部队；城北直到高家岗扩建成了飞机场，并附设了飞机零件制造厂。

当时的公主岭成了日本“关东军”盘据的重要巢穴。这时的“关东军”气焰嚣张，在我市横冲直撞，草菅人命。如果有中国人走近日本兵营和飞机场不是被逮捕摧残，就是被放出的军犬咬死、撕碎、吃掉，其惨景令人目不忍睹。这样的事情每年都要发生几起，甚至十几起。

至于“关东军”司令官指挥下的公主岭宪兵分队，迫害中国人民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备有各种刑具和狗圈，专门对付中国人民的所谓不轨行为。最残酷的刑具是一种称做“小飞机”的东西。这种刑具是内外两个长方形木槽，内槽65厘米左右宽，150~200厘米长；外槽130厘米宽左右，180~210厘米长；内槽两侧钻有许许多多直径30~40厘米的孔，外槽两侧的内壁正对着内槽的孔装上铁锥或小钢刀；内槽固定不动，外槽

可以左右横向活动。日本宪兵队就把抓来的所谓不法中国人仰面放在内槽里，用绳索固定住，使其不能动弹，然后用脚不停地踏“小飞机”的机关。于是，“小飞机”的外槽就左右地移动起来，它带着的锥子、刀子就不断地通过内槽的孔向里面躺着的人的身上刺去。“坐飞机”的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后，宪兵队就把他们往狗圈里一扔，让狗吃掉。

1943年3月1日，日本特务把持的伪怀德县警务科特务股成立了特侦班，分别在公主岭、范家屯、怀德城侦察反满抗日活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动态，对所谓嫌疑分子盯梢监督。日本宪兵、特务、警察依据自己的意愿和判断，对处于任何行为的人都可以逮捕，包括外出上街或旅行的人。1943年5月27日，警务厅特务科日本警佐金泽指挥特侦班的特务在怀德城一次就抓捕了20多名老百姓，加上“反满抗日”的罪名，送到伪吉林省警务厅刑押。他们这套法西斯手段，弄得群众人心惶惶。

日本军国主义就想以这种屠杀来实现他们长期霸占中国，形成“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

是侵略，还是“进入”？血写的事不是最好的见证吗？

（摘自《公主岭文史资料》第二辑）